

领导参考

Ling dao can kao

二〇一四年第二期 总第4期

内部资料 注意保存

重点推介

- 01 发展新说：“第一要务”
- 02 一带一路成亚洲经合新亮点

聚焦中三角

- 04 湖北启动碳排放权交易 碳排放配额逾 3.2 亿吨
- 05 武汉开发区：建产城一体化示范区
- 09 长江中游城市群共建具国际竞争力特大城市群
- 10 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对接长江经济带

探索改革

- 11 中国改革面临市场考验
- 13 中国金融改革滞后探因
- 16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传改革佳音

经济广角

- 18 中国三招可稳经济增长
- 19 中国必须打破产能过剩怪圈
- 21 中国经济的新“三驾马车”和“一台发动机”

科教文卫

- 24 文化“华流”如何走出去？

三农问题 县域经济

- 25 闽步入设施农业发展阶段
- 27 创新农业经营体系 上海新农人创业

社会观察

- 31 中国调结构应从保障网入手
- 32 中国共富道路满荆棘

综合治理

- 34 习近平吁党政领导讲廉耻

两岸四地 世界各地

- 37 二零一四国际安全形势十大看点

学术前沿

- 41 互联网金融

发展新说：“第一要务”

王长久《香港商报》2014年4月14日

本月10日至11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出席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后在海南考察调研。考察中，他多次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昨天，内地各大媒体均以显著位置报道了李克强的发展新论。

李克强“发展是第一要务”的提法之所以受到广泛关注，是因为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用的都是“发展是硬道理”的说法。而今，内地的发展观已经从“硬道理”变成“第一要务”。

变化彰显中国在进步

“硬道理”和“第一要务”有何相同点又有何不同点？

“硬道理”着重点在一个“硬”字。发展是硬道理是说，只有发展是硬道理，其它都不是硬道理，都要服务和服从于这个硬道理，比如环境保护、生活质量、资源损耗、高投低效等等。发展是硬道理在改革开放第一阶段是有非常积极意义的。相对于十年“文革”不重视发展、甚至破坏发展的历史，相对于以前那些过时了的经济学说，发展是硬道理就是要纠正左和右的无益论战，就是要统一人们的思想，就是要振聋发聩。可以说，发展是硬道理这个提法激发了全国的发展热情，改革开放30多年创造的中国经济奇迹，与这个发展观是有很大关系的。

但是，30多年的快速发展，30多年将发展作为“硬道理”，也给中国经济和社会带来了不少的负面问题。必须注意的是，“发展才是硬道理”并不等于“增长率是硬道理”，发展既要讲速度，又要讲效益。不能离开效益求发展。中国经济发展长期表现出高投入低效率，是典型的速度效益型。

很明显，在今后的发展中，发展不能再是无可争辩的“硬道理”了，对发展这个问题是可以讨论的，是要将发展与环境保护，与提高民生幸福指数，与投入产出比，与效益等问题联系起来，必须从根本上解决高速低效的问题。

而发展是第一要务，就是在强调发展的重要地位的同时，不排除其他问题的解决。既然是“第一”就不是惟一。各个问题之间的关系是有先有后的关系，是有主有次的关系，但都是要务，都是要统筹考虑、协调推进，就不是软和硬的关系，不是为

了发展可以忽略其它问题的解决。所以，李克强提出发展是第一要务，是中国在新的时期、新的中外环境、新的发展观，从“硬道理”到“第一要务”的变化，说明中国在进步，中国的领导智慧在升华，中国的发展观更科学，更可持续。

更多要靠无形之手

在过去的30多年，在发展是硬道理的发展观驱动下，中国政府在推动发展中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投资、消费、出口是中国高速发展的三驾马车，经济发展更多要靠政府投资拉动。如2008年，面对席卷全球的次按危机冲击，面对经济增速下滑的态势，中国启动了四万亿的经济刺激计划。此举虽然一时实现了“保八”，并曾让中国经济重回两位数增长，但政府投资拉动终究没有彻底改变国家经济发展大势，中国在2012年“破八”，诸如影子银行、地方债高企、银行不良贷双升等等问题逐渐显露，让中国经济发展更加被动。

而今，在发展是第一要务的发展观指导下，中国政府继续将发展摆在最重要的位置，因为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李克强在海南调研时强调，增长不出下限。但是在发展方略上，放弃了政府投资刺激的做法，李克强在博鳌指出，不会为经济一时波动而采取短期的强刺激政策。李克强在政府管控上作减法，在发挥市场无形之手作用上作加法。他在海口市工商局称，发展要靠改革，通过改革，把千千万万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调动起来；通过改革，办企业更加顺畅，办事成本也降低了，而创业又可带动就业、提高收入，实现这一低一高需要政府自身改革，也是民众的期盼，显示了改革的红利。

李克强的新发展观就是要向改革要动力，向调结构要动力，向改善民生要动力。可以相信，随着中国发展观从“硬道理”变成“第一要务”，中国将更加重视科学发展、协调发展，更加强调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更加强调通过发展改善民生。

一带一路成亚洲经合新亮点

伍敬斌《香港商报》2014年4月9日

为期4天的博鳌亚洲论坛年会昨起于海南举行，主题确定为“亚洲的新未来：寻找和释放新的发展动力”，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亦将于明天出席开幕式发表主旨演讲。与往年注重经济议题讨论不同的是，今年论坛进一步扩大了政治安全议题。专家表示，中国应担起大国责任，努力寻求共识，让亚洲真正发挥世界经济增长的新火车头作用。

此外，昨日论坛发布一份《小微金融发展报告》，显示内地仅四成小微企业从企业

税收优惠政策中获利。专家认为，目前优惠政策仍只是实验阶段，未来应拓展更多优惠空间。

“一带一路”官方谈判的有益补充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院长李向阳指，目前亚洲经济总量约占世界的30%。在过去一段时间，新兴经济体特别是亚洲地区新兴经济体增速普遍放缓，其中，中印等大国经济增速包括潜在增长率都在下调；另一方面，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大规模政府干预所留下的资产泡沫等问题在亚洲新兴经济体普遍存在，这些国家还面临着美联储QE退出的潜在风险，因此“普遍需要寻找新的经济增长动力”。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赵锡军亦表示，中国在亚洲舞台上不能也不应“独善其身”。中国已成为世界货物贸易规模第一大国，应利用自身在经济方面已有的成就，与其他经济体加强合作，共同趋利避害。

那么，在当前诸多不确定因素背景下，中国又应如何携手各新兴经济体国家，一道共克时艰，合作共赢？

李向阳指，亚洲各国的突出特征是由于不同的历史、文化所造就的巨大多样性，因此，为了加强经济合作和增进一体化，首要任务是寻求共识。如何用一个能够让多数国家接受的理念来加速亚洲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无疑是一大考验，而博鳌这样一个国际性民间经济论坛便是有关各方很好的讨论平台。

在具体层面的经济合作上，中国领导人倡导提出“一带一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构想，无疑是亚洲经济合作的最新亮点。李向阳认为，博鳌亚洲论坛是建设“一带一路”官方谈判的有益补充。他表示，“一带一路”就其本身而言是政府来推动，但最终还是要落到以市场为基础，“如果没有民间参与，仅仅靠政府投资，显然是不可持续的，两者结合来推动整个‘一带一路’，需要博鳌论坛这样的场合为沿线各国民间沟通、讨论搭桥”。

政治争拗影响亚洲经济一体化

2014年是亚洲新兴经济体的改革关键期，中国、印度、印尼等均在大力推进改革议程，并在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始终保持极强势头。然而现时情况是，亚洲各国政治上的矛盾却令亚洲经济一体化遭受严重挫折。“亚洲经济面临着一些公司甚至地方政府的短视和地缘政治的双挑战。缺少信任的情况越来越严重，有很多亚洲国家之间这个问题越来越突出。”耶鲁大学教授陈志武在论坛上如是表示。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孙立坚接受本报采访指，亚洲国家在刚刚过去的金融危机之中的表现可圈可点，一度曾被认为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新火车头。原因有三：第

一，亚洲国家拥有比较扎实的制造业，所以亚洲在危机当中没有多大摔倒，基本面比较稳；第二，在长期的实体经济发展中，亚洲积累了巨大的实体消费能力。亚洲有非常好的储蓄，这对于摆脱危机是最好的财富；第三，由于实体经济扎实，又有良好储蓄，金融业发展潜力十分优秀。

他说，亚洲国家之间的区域合作拥有非常好的潜力和前景。超过13亿人口的中国，如今正在进行的内需培育与社会福利体系的改革对亚洲贡献是巨大的。这些任务如能顺利完成，将给亚洲经济带来巨大活力，只要中国和亚洲进入到新的一体化平台上，将给亚洲国家带来一个多赢的结果。但是，政治的原因令亚洲区域内国家矛盾重重，中国等亚洲国家应在亚洲舞台上形成更多共识，真正让亚洲发挥经济“新火车头”的作用。

聚集中三角

湖北启动碳排放权交易 碳排放配额逾3.2亿吨

陈恒光 台湾《中央网络报》2014年4月2日

从2日在武汉举行的湖北省碳排放权交易启动仪式上获悉，2014年湖北省碳排放权交易配额总量为3.24亿吨，138家耗能大户企业被纳入碳排放配额管理。

根据大陆媒体中新社报导，2014年3月17日，湖北省政府常务会审议通过《湖北省碳排放权管理和交易暂行办法》和《湖北省碳排放权配额分配方案》，湖北成为继深圳、上海、北京、广东、天津之后，第六个正式启动碳排放权交易的试点省市。

湖北省发展改革委主任李乐成介绍，纳入碳排放配额管理的武钢、神龙汽车、华新水泥等138家工业企业，为2010、2011年任一年综合能耗6万吨及以上的工业企业，涉及到电力、钢铁、水泥、化工等12个行业，将对转变湖北的经济发展方式产生重要影响。

此次纳入碳排放配额管理的企业，当年碳排放量与年度碳排放初始配额的差额，超过企业年度初始配额的20%或20万吨以上，超出部分将予以追加或收缴。

当天，湖北省与山西、安徽、江西、广东等省签订了“碳排放权交易跨区域合作交流框架协议”；湖北碳排放权交易中心与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民生银行、上海浦发银行签署总额达600亿元人民币的“低碳产业发展与湖北碳金融中心建设授信协议”；湖

北省神农架林区与美国环保协会、湖北碳排放权交易中心签订碳资产开发与低碳扶贫框架协议。

截至当天13时，共有22家企业成功实现19笔交易，总成交量51万吨，累计成交金额1071万元，成交价为每吨21元。

武汉开发区：建产城一体化示范区

香港《文汇报》2014年3月10日

2014年是武汉开发区继续深化产城一体化建设的关键之年。十八届三中全会着力简政放权，激发经济发展的内生活力，宏观经济政策向实体经济倾斜，为开发区的新一轮大发展创造了良好外部条件。长江经济带战略和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的深入推进实施，也为开发区增添了新的发展动力。从武汉层面看，开发区是大车都板块整体崛起的龙头，是武汉三镇三城发展格局的核心增长极，全市的建设重点聚焦在开发区，未来武汉开发区仍将是武汉市各类政策、重点项目的首要承载地。

2013年，武汉开发区克服宏观经济形势复杂多变等因素影响，突出抓好产业发展、城市和生态文明建设以及民生工作，呈现出经济增长较快、城市功能提升、生态环境改善、社会事业进步的态势，有力地充当了武汉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引擎。2013年完成工业总产值4160亿元，增长25%；全口径财政收入282.77亿元，增长15%。实现招商引资总额201.2亿元，增长50%。

2014年，开发区将按照“以产兴城、以城促产、产城融合”的战略思路，深化产城一体化建设，全面提升城市的生产功能、生活功能和生态功能。工业总产值将实现5000亿元，全口径财政收入将完成315.38亿元。

加快产业结构升级

开发区将以东风雷诺、东风本田三厂、东风乘用车新能源汽车、东风史密斯半挂车四大整车厂落户为契机，吸引一批关键零部件企业落户，进一步夯实开发区主导产业优势地位。大力支持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重点引进关键技术研发、核心部件制造及新能源汽车整车项目。瞄准电子电器产业2015年实现千亿产值目标，不断壮大电子电器产业。

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方面，则致力发展战略型新兴产业。抓住国家低空开放机遇，加快推进通用航空产业园建设，围绕通用飞机制造、通用航空运输、通用航空辅

助服务三大领域，打造通用航空产业完整产业链。配合现代有轨电车示范线建设，推动低地板有轨电车及关键零部件组装、制造、维修基地落户开发区，打造轨道交通装备制造制造聚集区。加快推进国家卫星产业国际创新园建设，带动区域产业转型升级。充分发挥微软的产业集聚和带动作用，扩展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链，促进开发区工业化和信息化深度融合。加快总部经济区建设，推进渤海商交所华中总部、中文线上等总部项目落地。依托武汉出口加工区和长航汽车物流园项目，促进加工贸易和商贸物流产业发展。

打造城市“绿道”、“绿肺”

在产城一体化建设方面，开发区将全面提升城市功能环境，打造“产、城、绿”融为一体的特色城市空间。开发区已完成绿化建设投资3.4亿元，新增绿化面积80.1万平方米。目前，开发区城市绿地率达到34.4%，人均公园绿地面积14.3平方米。城市“绿道”、“绿肺”建设进展顺利。编制了全长约300公里的绿道总规划，一期30.7公里绿道及配套绿化景观建设工程建设完成。完成总面积33平方公里的绿肺建设总体规划、总面积18.9平方公里的绿肺核心区控制性规划和绿肺一期龙灵山生态公园2.9平方公里修建性详规的编制工作，龙灵山生态公园九曲湿地景区基本建成。湖湖连通有序推进，编制《开发区湖泊连通总体规划方案》。投资近7000万元，基本实现汉阳东湖水系内后官湖、三角湖、南太子湖、北太子湖等湖泊的水体连通。启动朱山湖水系连通工程。

促社会公共服务均等化

2013年，武汉开发区公共财政用于教育、社保、医疗等各类社会事业支出预计达6.1亿元，同比增长25.7%，高于经济增长水平。开发区保民生，重视社会事业发展，完成从“出生到养老”的社会事业发展规划，以重点项目建设为抓手，完善社会事业项目整体布局，全方位建设15分钟社会服务圈，实施以人为本的链条管理，促进开发区社会公共服务均等化。

再引四大整车厂落户 明年汽车业产值超3000亿

2013年，武汉开发区内神龙汽车与东风本田产值双双突破600亿元，刷新史上最高纪录。两车企累计产销95.34万辆，增长20.1%，增幅高于行业平均水平3-4个百分点，其中神龙公司生产企业55.45万辆，同比增长25%，东风本田生产汽车32.58万辆，同比增长14.2%。

去年武汉开发区还连续引进四大整车厂，包括东风雷诺、东风乘用车新能源汽车、东风史密斯半挂车等，新引进整车产能达到106万辆，投资总额超过350亿元。

2015年全部投产后，武汉开发区整车产能将达到230万辆，汽车工业产值将超过3000亿元，将极大提升开发区汽车产业集群的竞争力，强力支撑“中国车都”建设。此外，开发区成功引进东风格特拉克、武汉理工通宇电驱动自动变速箱和新能源专用汽车产业化项目、锐众汽车底盘转向系列产品项目、康佳汽车模具项目、亚普汽车塑胶油箱项目、东江阀业汽车电磁阀及液压阀生产基地项目、巴博士豪车定制改装博览中心项目、福耀汽车玻璃生产基地项目八大汽车零部件生产企业及新能源汽车研究院落户开发区。

科研投入加强 创新科技金融产品

开发区始终坚持“以产兴城、以城促产、产城融合”的发展思路，科技投入不断加强。2013年开发区全社会研究与开发（以下简称R&D）费用支出为60.35亿，占GDP的4.6%。其中，大中型工业企业继续发挥领军作用，全区220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有97家建有企业技术中心，196家拥有独立的技术团队，基本所有企业开展技术升级和自主创新活动，大中型工业企业R&D经费支出为43.11亿元，占总R&D经费支出的比重为71.43%。东本、神龙、格力等重点企业纷纷发力：东风本田提出中期事业计划，未来3年投放6款新车型，年销量提升至50万辆，其中新车“杰德”已在武汉投产；神龙公司总投资5.18亿元的新研发中心建成并投入使用，三厂全面建成投产，系列新车型和新动力总成产品成功投放市场；格力公司牢牢把握节能环保制冷设备工程技术的核心技术，用技术引领市场，在正式投产后不到一年通过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开发区企业在发挥科技创新主体地位的同时，政府对企业科技创新的扶持力度也在进一步加大。2013年，开发区支持企业开展科技活动资金为14.97亿，占总R&D经费支出额比重为24.8%。

科技型企业是自主创新的源动力，为了加快促进其发展速度，针对企业发展不同阶段的需求，开发区量身定做了一系列的科技金融产品。在孵化期，政府引导投资的种子基金和风险投资基金同时介入，在只有科技成果和创业团队的情况下，提供资本催化工具，形成创业合力。例如天高熔接、大禹阀门、福格森生物等一批马上挂牌上市的企业都是从开发区孵化器里面走出来的；在成长期，科技企业的无形资产，例如发明专利、商标权和股权等都可以纳入法定反担保抵押物范围，通过融资担保公司为科技型企业提供债权增信资本。区内企业通过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作为反担保物，累计获得担保资金已达近6亿元；在成熟期，开发区与国家开发银行共同搭建了首期10亿元规模的科技型中小企业集合贷款平台，使所有具有贷款资格的科技型企业都能获低息贷款。目前，开发区已经形成了总规模50亿元的科技金融服务能力，未来三年，这

一服务能力将扩充到100亿元以上。

1亿元支持民企倍增

近年来，随着武汉开发区经济规模壮大，开发区民营经济的发展也呈现出加速趋势。目前，开发区民营企业数量占开发区企业总数的65%，从数量以及销售额上看，开发区民营企业发展速度都超过开发区企业发展平均速度。

目前开发区已建立涵盖763家民营工业企业的信息库，制定《民营三十条实施细则》。多渠道帮助企业申报国家、省、市各类专项资金，累计获得各类资金支持超4000万元。建立高新技术产品备案奖励制度，31家企业获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大禹阀门股份有限公司等6家企业科技平台获批省级企业技术中心，1家企业获批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促进企业上市融资，25家企业进入省、市上市后备企业名单。探索投融资新模式，筹建中小企业创业创新金融平台，国家开发银行湖北分行为区内企业提供10亿元集合贷款。开发区拿出1亿元民企倍增专项资金，为开发区民企倍增计划保驾护航，资金扶持力度，居武汉市各区之首。

为加快民营经济发展，武汉开发区提出力争到2015年，实现民营经济在开发区经济中占比超过15%；到2020年，形成开发区国资、外资、民资“三足鼎立”的经济格局。开发区将用活用足“民企倍增三十条”及实施细则，推进民营企业产业园建设，在土地供应、工业技改贴息、科技成果转化资金、出口退税等方面给予民营企业以国有企业所享受的同等待遇，吸引高端人才到到开发区创新创业。

托管汉南 促两区深度融合

武汉开发区整体托管汉南区，在保持汉南行政区划不变、建制不变、功能不变的基础上实行统一领导、统一规划、统一建设、统一招商，实施一体化发展。有利于解决开发区发展空间不足问题，有利于加快汉南城乡一体化建设。目前，已成立机构融合、重点项目推进、规划调整、财税等四个工作专班，启动两区融合的相关工作。

大力推动汉南地区开发，对照大汉阳地区一体化发展的既定目标和武汉市委书记阮成发提出的实现六个一体化的要求，结合汉南地区特色和优势，实施汉南地区规划修编和报批工作，编制汉南地区新的产业发展规划，高标准规划建设汉南地区基础设施，推动大型基建项目向汉南地区倾斜。

加快谋划汉南发展，实现两区深度融合。按照六个一体化要求，当前重点做好规划、产业和基础设施融合，特别是抓干部融合。立足汉南现有基础，围绕两区发展方向，实施汉南片区产业空间发展规划编制和报批工作。规划编制多在两区优势互补上做文章，注重发展保护好银莲湖地区良好的农业和优质的养殖业，规划利用好汉南地

区长江、东荆河良好的港口和岸线。加强汉南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确保重要项目顺利落地。开发区大型基建项目逐步向汉南地区倾斜，确保通顺大道早日建成通车，高标准规划建设军山大道、檀军公路、汉南大道。确保公交先行，尽快实现沌口与纱帽的交通连通。此外，大力支持汉南地区社会事业发展，增加汉南地区教育、卫生和文体事业投入，完善书店、报刊亭、电影院等基础文化设施配套。

长江中游城市群共建具国际竞争力特大城市群

澳门《新华澳报》2014年3月1日

极有可能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第四极”的长江中游城市群，正积极部署新一轮协同发展战略。28日，湖南、湖北、江西、安徽四省省会城市在长沙共同签署发布《长沙宣言》，提出将合力共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特大城市群。

地处中国东西南北联接交汇处和长江经济带中间腹地、以湘鄂赣皖四省会城市为代表的长江中游城市群，如今已形成长株潭城市群、武汉城市圈、环鄱阳湖城市群和皖江城市带等核心城市群，既是新一轮长江经济带开发开放的重要支撑，也是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

长沙、武汉、南昌、合肥四市2013年达成《武汉共识》，提出冲刺“第四极”目标。一年多来，在文化旅游、交通运输、公共服务、产业经济等方面卓有成效。当前，已进入国家战略的长江中游城市群区域合作框架基本形成，《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规划》也已启动。

在新一轮合作战略上，四省会城市将按照“核心带动、多极协同、一体发展”原则，积极放大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多重叠加优势，共同打造以人为本、绿色发展、文化传承、面向国际的新型战略高地。

在已有的两型社会建设、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基础上，四省会城市将着力合作争取长江中游城市群纳入国家新型城镇化试点，并争取国家级新区、自由贸易园区、综合保税区等试点在四省会城市布局力度，全面提升长江中游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准。

此外，在基础设施及生态保护方面亦有部署，将争取更多国家政策支持，加快打通四省会城市间快速通道，联合打造长江黄金水道，构建长江中游环形综合立体交通运输网路；建立四省会城市环保联动机制，优先保障“一江三湖”（长江、洞庭湖、鄱阳湖、巢湖）及汉江、赣江、湘江等流域生态屏障安全。

国家发改委地区经济发展司司长范恒山表示，长江中游城市群极有可能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第四极”，但城市间的实质性合作才刚刚开始，仍需加快纵深发展。

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对接长江经济带

<http://www.CRNTT.com> 香港中评社 2014年3月18日

李克强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谋划区域发展新棋局，依托黄金水道，建设长江经济带。而在去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演讲中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之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已经如火如荼展开。

第一财经日报发表盘古智库城镇化首席研究员易鹏文章提出，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对接长江经济带，构筑H形经济大格局，推动中国和世界经济的创新发展。

首先，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对接长江经济带，有利于构筑H形经济大格局。当前世界经济被两条南北向的直线主导，一条是大西洋的南北直线，主要是美国和欧洲，一条是太平洋的南北直线，主要是中国、日本、韩国和东盟等。这两条南北直线占据了世界经济总量的75%以上，是当之无愧的世纪经济主导线。而目前世界经济发展的区域不平衡，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去打破，就是在这两条南北线中间建立一条东西向的经济带。这样有利于资源的更好流动，有利于缩小区域发展的差距。也因为有梯度落差，将使得有足够的动力去发展好这条线。故目前来看，从欧洲起步到中国西安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如能连接上长江经济带，会有利于构筑H形的世界经济大格局。

其次，丝绸之路经济带要发展起来，对于国内而言必须要对接长江经济带这条最有含金量的经济带。当前的中国经济中，长江经济带从上海一直到武汉、重庆、成都等，都是中国经济实力排前十名的城市。而丝绸之路经济带要想发展，必须要正视自身经济总量偏孝带动力不够、经济腹地有限的现实，只有和长江经济带这个中国经济的龙头强强联合，才能够让丝绸之路经济带做强、做实。

还有，丝绸之路经济带对接长江经济带有利于解决中国新型城镇化的三个1亿人的问题。尤其是要解决一亿人在中西部就地城镇化的问题。对接这两个地带，必定会有利于关中城市群、成渝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发展壮大；而这三大城市群必将成为中西部地区最有实力、最能承载更多人口和产业、最有带动区域发展能力的城市群；为此可以构筑出中国新一轮区域发展的核心动力的新的“中三角”，从而带动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新型城镇化的优化布局。

最后，丝绸之路经济带对接长江经济带，有利于这两个带的开放促改革，开放促

发展。这两带对接必定有利于中国的向西开放、陆地开放和向东开放和海洋开放，从而形成中国的综合开放格局。这种全方位的开放格局的形成，必定会有利于中国在更大回旋空间中发展自己，从而实现中国经济的梯度发展和区域均衡发展。

文章表示，要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对接长江经济带，必须未雨绸缪进行一些顶层设计和具体推进。主要要从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中央政府要从构筑H形世界经济大格局、打造中国区域新增长点和新棋局的高度，对这两个地带的对接进行顶层设计，进行国家层面的规划、引导以及扶持。

第二，两个地带的各省市区必须树立共生崛起的理念，只有舍弃只顾自己一亩三分地的狭隘思想，才能构筑出发展的大格局。

第三，要将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构筑大交通和大流通格局作为具体抓手，有必要建设西安到成都、西安到重庆、西安到武汉、成都到格尔木、重庆到兰州、成都到重庆、重庆到长沙、重庆到武汉、武汉到长沙的快速通道。主要体现在高速铁路、高速公路、货运铁路、特高压电网、信息高速公路、民航机场通航机场等综合型的基础设施上，由此推动新的“中三角”变“平”，推动各种要素的自由流动。

第四，要坚决推动两个地带的市场一体化、社会保障体系的一体化工作，构筑统一开放的国内市场，构筑人和各种要素的自由流动的基矗。

第五，要通过媒体给这两个地带造势，让这种区域一体化的品牌带动更多推动区域增长的外生和内生动力。

改革探索

中国改革面临市场考验

亨利·保尔森 英国《金融时报》2014年3月26日

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一年半前上台以来，中国政府对经济改革作出了大量承诺。这些承诺包括，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消除一直以来阻碍私营部门发展的监管障碍，并增强中国的社会保障网。

这些承诺值得欢迎。然而，市场参与者和商界领袖眼下仍在等待这些承诺得到执行，与此同时将保留判断。

然而，我们不能以不切实际的期待、或以自由市场的基本元素来评判这些改革。

习并不打算以七国集团(G7)国家为模板，重塑中国经济。认为中国政府将干脆把113家央企私有化，也是不现实的。

“改革”面临的真正考验，不是改革是否会推进，而是它会以何种方式推进。习的改革会不会欢迎货真价实的竞争？

竞争是市场经济的生命线。让竞争为中国经济树立纪律，将产生积极而持久的效果。只有在领导人抛弃不利于竞争的政策的情况下，市场才能发挥中国政府希望它发挥的“决定性”作用。

有3项关键的考验。首先，中国领导人会不会向私营企业开放包括能源、金融和尖端科技在内的大多数领域，从而允许它们与国企竞争？其次，中国领导人会不会撤销补贴等保护国企免受市场教训的政策，并强迫国企在公平的条件下参与竞争？第三，中国领导人会不会让中国经济向外资竞争者开放，让中国企业与代表业内最高水平的企业同场竞技？

最近召开的“两会”为我们解答这些问题提供了一丝线索。自去年11月中共推出全面改革方案以来，“两会”首次为中国领导人提供了一个机会，重申自己的承诺，并开始着手将其付诸实施。

坏消息是：经济改革仍是个巨大的挑战。中国领导人眼下要让一艘巨轮改变航向，这非常困难。上世纪90年代，中国上一次实施真正意义上的改革时，就已经困难重重了。那时，中国的名义国内生产总值(GDP)只有1万亿美元。如今，这个数字是9万亿美元，改革的节奏、范围和次序问题也非常棘手、并且富有争议。

但也有一个好消息：人大会议已明确表示，经济改革不会走回头路。习的反腐运动，也向反对改革的既得利益阶层释放出一个强烈的信号。

中国领导人正采取措施鼓励竞争。不过，改革仍需要进一步深化和加快。就拿第一项考验来说，许多行业仍未放开竞争。这些行业被大型国企主导，形成寡头垄断的局面，使得私营企业没有多少参与空间。

大型国有银行主导了资金分配，将大部分资金导向了国有企业。但这种模式或许在变化。习已承诺将允许成立完全私有的银行，部分旨在提振对企业的贷款，以及缩减影子市场。

从长期来看，改革必须延伸到金融服务领域以外。经济中仍有许多完全受到保护的领域。如果中国政府让这些领域保持封闭，就会挫伤企业家精神和创新，并使得中国今年创造1000万至1200万工作岗位的目标无法实现。

第二项考验事实上或许会更加严峻。撤销补贴会暴露一些国企的低效，导致裁

员、并可能催生社会动荡。

中国政府可以采取步骤撤销对国企的优待、断掉国企享有的宽松信贷和廉价能源。一种解决方案是深化利率改革，实现最近宣布的那项雄心勃勃的计划：在两年内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并放开存款利率补贴也是一样，中国政府已宣布将采取措施，提高资源税、并迫使行业进行整合。能源定价合理化也有利于中国转向能源密集度较低的增长模式。

最后，中国政府必须向国外竞争开放市场。在金融服务业等许多行业，外资企业都是全球的领军者。中国许多人赞同国内改革，却希望排除外资竞争。但中国将受益于外资企业带来的业务操作方式。

中国政府在与美国和欧洲的双边投资协定谈判中，同意采用“负面清单”，除负面清单上特别列出的行业以外，其他行业都对外资开放，这意味着中国政府原则上已承诺要迈出这一步。

上述举措表明，中国政府理解竞争的必要性。但华盛顿和布鲁塞尔方面应加紧行动，敲定与中国的上述协定。这将考验中国领导人是否已下定决心，要引入和支持竞争，而非为了改革而改革。

中国金融改革滞后探因

陈建奇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 2014年4月1日

当前中国众多经济改革中，与公众财富密切相关的金融改革引发社会普遍关注，近期信托等产品违约风险升级更是警示金融改革迫切性。相比其他改革，金融改革尽管也伴随改革开放而稳步推进，但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却未能出现金融改革的同步大幅推进，金融发展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挑战，如近年来美国等外部国家对人民币汇率升值施压、热钱跨境流动越发频繁、外汇储备被动高位累积、信托金融及影子银行等井喷式发展等，诸多现象暴露了中国开放金融潜在问题所在，更有评论指出中国陷入经济大国与金融弱国的尴尬局面。

业界期盼借金融危机促使政府加快推进相关改革，但始于中国20世纪80、90年代的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至今尚未实现，金融改革滞后成为不争的事实，政府方面也在释放迫切加快金融改革的信息。为何当前中国金融改革难以推进，近年来热捧的自贸区金融改革也明显低于预期，种种迹象凸显中国金融改革的难处，必须理性评估。

当前金融改革滞后的根源

理解金融改革必须区分金融制度与金融市场，金融制度的好坏会制约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但金融市场是否完善还有赖于微观主体的竞争等因素，从而政府在金融改革中更多侧重金融制度改革并辅予相应的金融市场监管。从这个意义上看，利率、汇率市场化及资本账户可兑换成为中国金融改革的核心内容。上述改革实质上是将利率、汇率等资金价格及资本流动从行政管制转由市场决定，在操作上更多是技术性的，却又迟迟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根源在于利率、汇率、资本流动与国民经济其他领域息息相关。当前金融改革滞后并非简单的技术操作所能实现，而是有其更深层次的制约因素。

首先，宏观经济稳定性制约金融激进式改革。资本与劳动、技术共同构成经济发展的三大要素，金融改革必然影响到资本配置，对宏观经济稳定性将构成冲击。比如，从中国现实来看，尽管贷款利率已经市场化，但存款利率仍然受到行政管制，民间利率显著高于官方利率的现象显示官方利率的低估，由此促使大量资金转向较高收益的影子银行、信托产品等领域，滋生庞大的金融监管盲区。

在此背景下，激进式的利率市场化改革将大幅提升之前享受低利率的大型企业的资金成本，相关企业可能因此面临困境甚至破产，而先前依赖存贷差保障的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利润可能大幅缩窄；

同时支撑房地产发展的廉价资金流入将因此大幅减少甚至逆转，房地产市场风险将急剧上升，又反过来影响依赖土地出让收入的地方财政，地方融资平台的风险也将陡升。这反映出金融改革对宏观经济稳定的潜在影响，而一步到位的激进式金融改革可能将相关风险骤然放大，期待快速实现金融改革目标的民众觉得金融改革滞后也就不足为奇。

其次，金融抗风险能力建设滞后阻碍金融改革进程。尽管金融改革成为宏观经济稳定的较大影响因素，但如果抗风险能力很强，那么金融改革也能持续推进。然而，当前中国金融抗风险能力建设仍在发展，尚未形成健全的风险防控体系。存款保险制度尚未确立就是一个例证，自从20世纪30年代美国率先推出存款保险制度以来，世界上很多发达国家都构建了存款保险制度，为保障金融体系乃至宏观经济稳定起着重要的作用，但中国目前仍然未能构建这一制度。综合的金融抗风险能力建设的滞后成为金融改革如期推进的巨大障碍。

第三，渐进式改革倒逼金融改革停滞。中国理性采取渐进式改革，规避激进改革带来的不确定性。然而，中国的渐进式金融改革不是各项改革前后有序分别推进，而是利率、汇率、资本账户等各种改革渐进同步推进，选择香港等离岸市场、上海自贸

区等进行试点，借助贸易的人民币结算等手段促使离岸市场规模扩张，这些措施对于促进金融开放发展起着重要作用，但离岸与在岸市场的利差、汇差引发了显著的热钱跨境套利、套汇活动，比如去年香港“货物一日游”引发了社会各界对于当前渐进式改革的担忧。为避免类似问题的发生，相关部门采取了更加严厉的资本管制，自贸区等金融试点相比之前更加慎重，导致相关金融改革步伐出现显著放缓。

第四，体制利益阻碍金融改革推进。当前的金融改革是对之前不合理的金融制度的调整，属于非帕累托效率的改革，必然触动相关部门的利益。利率市场化将引发依赖利差收入的商业银行的利益损失，享受行政管控低利率的企业利益也将受到影响，汇率市场化引发的汇率波动增大出口企业的汇率风险，同时也增大巨额外汇储备的保值增值压力。金融改革与其他改革一样，受到既得利益群体的反对，如果缺乏强有力的改革决心和执行力，那么金融改革推进速度或者力度都可能低于预期。

第五，发达大国政策溢出效应影响金融改革。资金与其他要素重要区别在于其不容易监控，资金跨境流动不必经过海关，瞬间就可能在世界主要国家出现资本的频繁进出。发达国家特别是主要货币发行国在本次危机以来持续实施量化宽松政策，营造超低利率环境，中外利差客观上将引发资本的跨境流入诉求，而去年底美国经济复苏超预期促使美联储启动退出QE的计划，反过来可能引起包括中国在内其他国家的资金流出，发达大国的政策溢出效应不仅导致中国货币政策的被动，而且影响中国国际金融稳定性，短期内可能引发汇率的非理性波动，加剧资本流动的不确定性，影响或者干扰了汇率、资本账户等金融改革进程。

金融改革提速亟待四大转变

金融改革滞后具有其内在的根源，但也突出了潜在的问题，未来如果不加快推进金融改革，那么中国经济社会健康发展不仅受到制约，而且金融风险将持续累积。今年以来中国信托产品风险突变事件、房地产不确定性增大、地方融资平台可持续性备受关注，这都预示加快金融改革的重要性。北京三中全会也提出要完善金融市场体系，显示政府对金融问题的重视。然而，正如上面所说，金融改革牵涉诸多方面的内容，必须创新改革思路，否则或难改变先前改革迟缓的问题，对此，结合中国当前经济发展诉求，加快金融改革必须实现四大转变。

一是从注重宏观稳定向注重风险管控转变。改革可能引发经济社会的波动，过分注重宏观稳定可能束缚金融改革的手脚，反之，如果加强风险管控体系建设，提升中国应对金融改革风险的能力，那么金融改革更快推进就有可能。一方面，必须加快构建存款保险制度等制度建设，提升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及金融体系的抗风险能力。另

一方面，重点推进房地产市场调控、地方融资平台治理，适时实施地方政府透明的发债制度，从根本上实现地方政府融资透明、可控的问题，降低金融改革所可能引发的系统性风险。

二是从注重试点综合推进向注重改革顺序分类推进转变。金融各项改革影响不同，其实施的条件及推出的时机也不同，目前还难以解决离岸市场或者自贸区的试点渐进综合改革所带来的套利、套汇等金融低效率问题。创新思维，从注重试点综合推进转向注重改革顺序分类推进有助于解决上述问题，从理论上讲，利率市场化改革需先行，汇率紧跟其后，最后才是资本账户可兑换。当前已经实现了贷款利率市场化，未来可以考虑先构建存款保险制度，逐步增大存款利率上限并最终实现存款利率市场化，促使国内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稳步实现经营模式转型，降低对利差的依赖，做大做强国内金融机构，促进国内金融市场创新。在此基础上，推进汇率市场化改革，可以重点考虑增大汇率波动区间，理顺汇率中间价形成机制。最终在合适时机推行资本账户可兑换改革，促使国内外金融市场有效联通。

三是从注重自下而上倒逼改革向注重自上而下主动改革转变。金融改革受到的利益群体的阻力不亚于其他改革，这既有政府职能部门的协调需求，也有企业的盈利诉求。在当前迫切需要加快金融改革的背景下，通过自下而上改革探索可能贻误改革良机，也可能引发低效率问题，必须通过顶层设计，加强全局研究，强化自上而下的执行力，确实破除利益群体的阻碍。中国目前已经成立的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有助于解决此问题，将金融改革与其他改革协同推进，既是新机构的任务所在，也是外界对新机构的期待。

四是从注重外部影响的被动应对向注重主动参与全球金融治理转变。全球化是各国面对的共同环境，开放经济体与外部联系日益密切是大势所趋，危机以来世界各国复苏增长分化注定国际宏观政策协调越发重要。在此背景下，中国推行金融改革不能坚持传统被动应对的心态，特别是宏观货币金融政策具有较强的溢出效应，必须创新思路，通过二十国峰会或者金砖峰会等全球或者区域治理平台，主动参与全球金融治理，倡导世界各国实施负责任的宏观政策，为中国金融改革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传改革佳音

《香港商报》2014年3月23日

昨起至24日，“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4”年会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本次年会

主题为“全面深化改革的中国”，顾名思义，“改革”成为论坛最强音，各路高官巨贾和专家学者传出了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好声音。

中国仍要进行重大改革

昨天年会上，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表示，改革资源是有限的，要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336项改革中，“选出那些最为重要的和关联性最强的少数改革项目，形成‘最小一揽子改革’”。他表示，中国当前面临的最大的风险在财政金融部门，根本性解决要靠提高效率。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指，中国改革最大的风险就是没有重大改革；社会改革比经济改革更重要。他指，影子银行、地方债等问题均是不改革的产物。他建议，应当找到改革突破口，既要考虑经济增长，又要让民众得到实在的好处。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认为，中国经济转型期的改革，要以破除行政性垄断、促进竞争为重点，加快基础产业领域的改革。破除垄断要有标志性的动作。

外交部副部长张业遂表示，中国助推“一带一路”（即“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主要出于三方面考虑：首先，是新一轮改革开放的需要；其次，是推进亚洲区域合作的需要；再次，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他指，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的重点。陆上口岸和海上港口，陆上道路和海上航道都是新时期丝绸之路建设的支点和重点。

金融改革仍是关注焦点

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表示，2014年，世界经济面临美联储货币政策走向、欧洲形势、日本经济、新兴市场发展、新地缘政治挑战以及整体政策等六大不确定性。他认为，美联储宣布退出QE最关键的是对预期的调整，美方“加息”预期表明美国经济复苏进程巩固，因此是一大“利好”。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易纲指，今后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将成为常态，存款利率市场化今明两年将有实质性的进展。他指，汇率双向浮动弹性会增强，将主要由市场供求来决定，央行作用将逐步减弱。未来几年，中国金融改革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推动金融市场对内对外开放，发展民营银行、多层次资本市场，明显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二是放开要素价格，让市场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在金融方面将会推进汇率、利率市场化和资本项目的开放。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建言，中国外汇市场改革要划清央行权力边界，这是改革的关键所在。

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吴晓灵则认为，人民币虽已成为全球第七大支付货币，但“人民币时代”还没有到来。在她看来，人民币时代的到来取决于内地金融改革，“重要的是做好中国的事情，其他的顺势而为”。

高等教育将有革命性调整

此外，教育部副部长鲁昕演讲时透露，中国高等教育将发生革命性调整。1999年后600多所“专升本”的地方本科院校将逐步转型，做现代职业教育，重点培养工程师、高级技工、高素质劳动者等。她指，上月底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已就此作出决定，相关政策性文件即将出台。她强调，将充分发挥市场作用，用市场力量来办学。今后，各类职业学校可实行股份制、混合所有制，让教师和企业管理人才、校长和企业CEO可自由转换身份，打造灵活的办学体制。她还透露，今后将实行技术型与学术型两种高考模式。

经济广角

中国三招可稳经济增长

赵令彬 香港《大公报》2014年4月14日

周前中国出台了三招推动经济以抗下行风险。今年头二个月经济出现了明显放慢的急冻现象，为了稳增长保就业，当局自须出台一些刺激手段。但这并不表示将转向扩张性财政及货币政策，至少以目前情况看尚未需要出重手。

三招是强化对小微企业的税务优惠，加大棚户改造力度，和增加铁路建设投资等。小微企业目前已可在一定上限内减半征税，新招把上限提高和延长优惠期至2016年底。棚户改造今年的目标是470万户，为配合此项计划及城市基建，国家开发银行将发行专项债券集资。今年的铁路建设目标包括建成新线逾6600公里，比上年增多逾千公里。为此将增加投资至逾7000亿元，故将设立铁路发展基金，可年集资2000至3000亿元人民币。

以上三招有几个特点值得注意：（一）都是为了刺激投资而设计，希望由此强化内需，基本上仍是由投资带动的经济模式。（二）导向性较强。产业方面导向铁路及住房建设，由此拉动相关行业。企业方面则导向小微企业，和与铁路及住房相关的企业。

（三）属局部性刺激措施，而非影响全面的扩张性财政及货币政策。（四）直接财政投入不会太多，大部分资金都会通过市场筹集。

上述措施的设计基本合理和符合当前国情，增加投资乃最直接有效的强化内需支撑经济途径，由此还可拉动消费增长，之前几次采用这种做法都功效显著。导向经济型住房及铁路等目标，都是短缺而非过剩领域，既有助改善经济结构及民生，也不会造成更多的产能过剩，故同时是优化结构政策。这类投资还可拉动重工生产，从而改变工业偏冷的格局，而这正是当前经济放慢的主因之一。

对小微企业加大税务优惠用意良好，有助减轻其运作成本，特别是较高的融资成本。然而税务政策只能起间接作用，不如以计划引导投资来得直接有效。事实上小微企业正要面对本身及经营环境中的诸多问题，并非单凭税优政策可以解决者，还须有其他多种措施配合。因此这一招乃三招中最弱者，当局应考虑更有针对性的援助机制，如成立专门基金向有质素的小微企业注资以分担风险，和专门顾问机构以助其改善经营管理及升级转型。

此外，还须注意成立基金投向铁路，和发债支持城建等新融资机制，或会令本已高企的债务负担更形沉重，与当前中国经济需要去杠杆化的大方向不符。故当局应更多考虑股权融资的方案，从而提高铁路及城建项目的抗风险能力。

中国必须打破产能过剩怪圈

徐瑾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 2014年3月27日

当潮水褪去之际，才知道谁在裸泳。经济也是如此，当增长放缓之际，昔日蒸蒸日上生产能力也开始凸显出过剩压力。

最近中国社交媒体内流传一份全球钢产量排名，第一名是中国（不包括河北）第二名是河北（不包括唐山），第三名是唐山（不包括瞒报），然后是日、美、印、俄、韩、唐山（瞒报产量）、德国。

这份名单戏谑之余，也揭露了中国产能过剩幕后的冰山一角，那就是中央调控与地方瞒报的猫鼠博弈。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中国工信部副部长苏波即表示，产能过剩的原因之一正在于政府对微观经济的干预过多，尤其部分地方政府以追求经济和财政收入的高速增长为目标，通过低地价甚至零地价供给、税收减免、财政补贴等方式招商引资，扭曲了市场信号，影响了企业正常的投资决策。

如今中国不少行业都面临产能过剩，尤其是钢铁、水泥、光伏等领域更是全行业过剩，中国国家能源委员会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张国宝去年曾经列举一份数据，表示不少行业生产已经接近或者达到了峰值，“仅仅河北迁安县（市）一个地区的产量就超

过了德国，唐山地区钢产量超过了欧洲……水泥、船舶、太阳能、风力发电设备均表现出产能过剩，包括发电设备制造在内，产能已经达到年产1.6-1.8亿千瓦。”

中国产能过剩是不可回避的现状，那么如何解决呢？这是一个有趣的争议话题，苏波认为化解产能过剩和深化改革将同转变政府职能相结合，大幅度减少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减少政府对企业投资活动的行政性干预。

然而，苏波发言之后，一位在场的发改委官员即表示，化解产能过剩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外一个极端，需要考虑政府和市场的结合。

这位官员“一分为二”的发言代表了不同部门对于产能过剩的理念差异，甚至也暗示了中国决策层对于产能过剩现象的矛盾心态：一方面政府尤其地方政府是产能过剩推手是不争事实，另一方面最终约束的方法却离不开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的行政手段，导致付出代价的往往是企业甚至是民企——例如江苏名噪一时的“铁本事件”正是一个绝佳案例，以削减产能过剩之名，行极端方法减产能，效果如何呢？即使一家野心勃勃、实力不菲的企业从此步入陨灭，多家国有金融机构遭遇财务损失，却无法彻底根治产能过剩的行业固疾，冒险与金钱、权力故事仍旧在中国各地继续。

产能过剩不是新话语，但近年才开始进入中国官方决策核心议程。值得一提的是，习李政府的首次中央经济会议之上，对于产能过剩不可不谓重视，强调“经济运行存在下行压力，部分行业产能过剩问题严重”。对比之下，胡温时代的宏观调控往往纠结于经济冷热问题，这并非当时没有产能过剩，而是因为产能问题被国内消费以及对外出口所掩盖。

换言之，如果说过去产能过剩只是一个可能隐患，如今则已经成为会随时爆发的定时炸弹，近年产能过剩的数据攀升颇能说明问题。

根据经济学者刘海影对全球214个国家经济数据的研究，过剩产能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影响，低过剩产能国家平均经济增速是高过剩产能国家的3倍。根据他的研究，韩国在1996年过剩产能超过了30%的门槛线，随后1997年东南亚危机爆发，韩国经济遭遇重创；对比中国，在2008年之前的过剩产能已经比较严重，大约在23%左右，2008年之后过剩产能飙升，到2012年年底已经超过32%，去年则继续上行。

经济有其规律，任何短暂的狂欢终究会面临漫长的偿付。中国产能过剩率的攀升，对应着是四万亿刺激政策以及国内巨量投资。近年债务风险引发关注，但我始终强调，实体层面的产能过剩也就是金融层面的债务累积，经济运行存在下行压力、部分行业产能过剩问题严重、宏观债务水平持续上升，三块看似独立的问题正是中国经济症结的三位一体，其最终结果则导致经济系统性风险的加大。

解铃还须系铃人。如果产能过剩的增长惯性在于地方政府的增长冲动，那么“宏观过热，调控民企”的老路注定无功而返。对应当下的经济形势，承认过剩产能根源所在，消化吸收过剩产能将是不得不付出的代价，那就意味着两条出路，那就是化解存量消除增量，一方面必须允许甚至鼓励有序破产程序，让不再具有经济合理性的企业出清，另一方面则应该进一步约束地方政府对于经济的介入，这也关系未来中国社会规则与法治重塑的方方面面。

中国经济的新“三驾马车”和“一台发动机”

谭浩俊 美国 商业周刊中文网 2014年3月14日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5日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说，今年要增强内需拉动经济的主引擎作用。

虽然说出口仍然是中国经济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仍然需要引起高度的重视与关注。但是，就眼前的情况来看，指望出口像前些年那样带动中国经济增长、带动就业、带动居民收入提高，可能性已经不大。那么，内需也就成了必须抓好的经济引擎。

而从李克强总理的报告来看，今年乃至今后若干年内，引领中国经济的将主要依靠新的“三驾马车”以及“一台发动机”。将“马车”安装上“发动机”，无疑比单纯依靠“马”的力量，将更具前进的动力。

新“三驾马车”，就是指消费、投资和新的区域经济，“一台发动机”就是指改革。其中，消费发挥基础性作用，投资发挥关键作用，新的区域经济发挥战略作用。改革则通过体制、机制的创新，思路、理念的转变，思维、观念的提升，对“三驾马车”作用的发挥，产生强大的推动与促进作用。

对消费来说，最紧迫的任务，就是要借助改革的力量，将消费的内在潜力激发出来。都说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市场，而且消费潜力巨大。但是，消费对中国经济的作用，似乎并没有理论上所描述的那样大。

金融危机爆发以前，拉动中国经济的主要力量是出口，而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则转变成投资。虽然消费在这些年的经济增长中，也偶尔出现一些闪光点，会在短时间内对经济增长产生比较大的作用。

但总体上讲，作用没有投资和出口明显。尤其与投资相比，出口的潜力在不断地被挤压，以至于每当需要对经济采取拉动政策时，首先想到的都是投资，而不是消

费。

在出口已经遇到严重障碍、投资也遇到一些瓶颈的情况下，消费毫无疑问应当发挥新的引擎作用。但是，要更好地发挥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依靠传统思路显然是远远不够的，而必须充分借助改革的力量，将改革红利与消费红利紧密融合到一起。

一要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有效增加居民的收入水平，提高居民的消费能力。基本目标，仍然是“提低扩中抑高”，尤其是扩中，应当成为改革的最主要目标，真正形成收入分配的橄榄型结构；

二要建立新的消费模式，从等待消费转向引领消费，特别是服务消费，要通过不断改革服务理念、创新服务产品、增加服务产品，来引导和鼓励居民消费，如养老、健康、旅游、文化、休闲等；

三要培育新的消费热点，要依据居民消费习惯的变化以及消费需求的渴望，组织力量研究和分析消费热点，尤其是年轻人比较热衷的消费产品，要多研究开发、多推广运用，如互联网、4G、三网联合等；

四要加快流通体制改革，消除影响消费的体制障碍、机制障碍，减轻消费者负担，以此推动居民提高消费能力和扩大消费热情；

五要适时出台消费政策，特别是配合消费热点的政策，必须及时推出，以便于更好地发挥消费热点的作用。也唯有这样，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才能得到有效发挥。

就投资而言，常规的投资手段和方法，特别是地方政府用来制造政绩的投资方式，显然已难以为继。也就是说，要发挥投资对拉动经济的关键作用，就必须加大投资体制改革力度，创新投资思维，开拓新的投资思路。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重点应当抓好这样几个方面的工作。

首先，改革政府对投资的管理和审批制度，弱化政府对投资的热情。一方面，政府不要再过多地介入到投资工作中去，不要再过多地进行直接投资，更不能负债投资；另一方面，政府对投资的审批，重点应放在是否符合产业结构、是否存在环境污染、是否会出现重复投资等方面，而不要再审批具体的事项。

第二，改革投融资体制。投资项目的审查、投资资金的配备、直接或间接融资的比例、融资的方式等，都需要改革；

第三，要充分调动社会资本的作用，无论是企业投资项目还是政府投资项目，都要尽可能地发挥社会资本的作用，调动社会资本的力量，政府投资只能起引领和带动作用，譬如贴息、补助等，原则上不直接投资建设项目；

第四，要优化投资结构，生产性投资与非生产投资的关系必须调整好，努力增加生产性投资，而生产性投资中高新技术、新兴产业、高端装备、节能环保等产业的投资比重也要提高，以增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和国际竞争能力。只有这样，投资对经济增长拉动的关键作用才能发挥。

在新区域经济发展方面，应当说，潜力是十分巨大的，也是完全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就对经济形成较大促进作用的。

众所周知，中国经济能够在三十多年的时间内，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很大程度上与区域经济的发展是分不开的。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经济带、京津冀等，特别是珠三角和长三角经济带，更成为拉动中国经济的最主要引擎。

对已经形成规模和带动力的经济区域来说，当然是提升和扩展。但是，中国经济发展，显然不能依靠现有的经济区域，而必须开辟和发展一批新的经济区域，并逐步从沿海向内地、从东部向西部、从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推移。

东北老工业基地，无疑是新的区域经济的重点之一，这里既有良好的工业基础，又在严重的产业结构问题，如何在思路创新，是值得好好研究的问题；西部地区有着良好的资源环境，重点是交通不便，人的思维落后，如何从这些方面寻求突破，将能够嬉闹多个新的经济区域；中部地区在上一轮的发展中，也没有太大的进展，在新一轮发展中，毫无疑问应当有所突破，重点在政策上应当给予中部地区更多支持。一旦政策到位，新的经济区域很快就会涌现。

而要建立新的经济区域，从起步开始就按照改革的思路，在行政体制、经济体制、管理体制等方面加大改革力度，建立更加符合市场化要求的体制，将十分关键。改革红利，应当也必须在新的区域经济发展中得到更多释放。

总之，新的“三驾马车”和“一台发动机”，如果能够有机协调与配合，再加上出口这驾老马车，不仅完成今年7.5%经济增长目标大有希望，实现中国经济“第二春”的目标也可以充满信心。

文化“华流”如何走出去？

吴旭《澳门日报》2014年3月12日

同“家风是甚么”“你的时间去哪儿了”一样，在今年全国两会上，“你看过《来自星星的你》吗？”也成为不少记者追问代表委员的问题。“韩剧为甚么走红？”“如何在海外形成‘华流’？”“中国文化如何真正走出去？”全国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小组讨论会上，围绕“韩流”势不可挡，而中国文化产品走出去步履艰难的话题委员们讨论热烈。

传播为软实力关键

从去年风靡一时的“骑马舞”到如今火爆荧屏的《来自星星的你》，新一轮“韩流”强势来袭，中国居民赴韩旅游热也悄然兴起。“这需要先反思两个问题”，全国政协委员、原湖南卫视台长欧阳常林说：“其一，韩剧能够占领中国市场并输出本民族的文化价值观，影响到国内大批青少年，为甚么国产剧就做不到？其二，为甚么韩国有强大的‘韩流’能代表本民族软实力，而具有五千年历史文明、泱泱大国的中华文化在海外却不强势？”欧阳常林表示，中国的市场和资金、人才和资源远远超过韩国，经济文化实力已不断增强，可是“华流”千呼万唤就是不出来，这值得文化从业者和文化管理者反思。

当前，世界主要国家普遍把加强对外传播作为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手段。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和对外话语体系建设，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政府工作报告时也强调，“加快文化走出去，发展文化贸易，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近来中国有越来越多文化作品和产品通过不同渠道、载体走向国门，向世界展示中国多姿多彩、充满活力的国家形象。但总体上，仍是出去的少，进来的多。全国政协委员、北京交响乐团团长谭利华直言，“华流”在海外难以被受众接受，直接原因就是近年一些低水平的文艺也在出口。“中国现在很多音乐团体到国外演出，如一窝蜂去维也纳金色大厅，都是为了去‘镀金’。”

加强审核艺术水平

第一个以中国民歌歌手身份登上维也纳金色大厅的政协委员宋祖英坦承，中国演

出团队去维也纳金色大厅演出已经成为一种灾难，不仅造成浪费，对艺术走出去不负责任，还对国家产生负面影响。宋祖英呼吁，应加强国内文化艺术“走出去”的审核，以保障“文化走出去”的水平。

“在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方面，也应以提升内容生产质量为突破口，充分发挥市场、资金、传统文化等方面的优势，”欧阳常林表示：“生产出体现中华民族文化价值的外向型文化产品，打造国际化的内容品牌，才能形成具有影响力的‘华流’。”

三农问题 县域经济

闽步入设施农业发展阶段

史兵 香港《大公报》2014年4月16日

八山一水一分田的福建省，人均耕地只有半亩，比世界上土地资源最为匮乏的以色列的人均设施面积还少一半。保证福建人的粮食安全，是闽省当局必须认真面对的难题。福建省农科院院长刘波在接受大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福建已别无选择地走上了现代农业工业化之路，近年来积极推进设施农业发展，并且已经取明显成效。

由于缺少耕地，福建历来就是全国三个缺粮大省之一，目前闽省的粮食自给率不到37%。而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优质可耕地还在不断减少；加上种粮比较效益低，一些地方农民种粮热情不高，耕地抛荒现象日趋严重；而频繁发生的自然灾害常常造成粮食减产，甚至绝收，也严重打击了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面对严峻的现实情况，闽省当局尤其是农业部门，积极引导农民走现代农业工业化之路，推进设施农业快速且高水平发展。

设施改变“靠天吃饭”

刘波说：设施农业是现代农业发展的标志之一，其核心是运用工业化理念进行农业投资与运营，具有高投入、高产出、高效益、高标准、网络化、自动化、机械化、商业化、省土地、节人工等十大现代农业模式特征。它通过人为控制小气候，有效利用光热水土资源，优化配置各种要素资源，促使现代生物技术、工程机械技术和信息技术在农业上的广泛应用，这是农业发展史上的又一次革命，它彻底改变了“靠天吃饭”的传统农业模式。

刘波指出，在人均耕地严重匮乏的福建省发展设施农业意义重大。首先是不用良

田，利用丰富的山坡与海滩就可以，而且建立1公顷设施农业，可以节约5公顷土地；其次，福建的自然生态环境条件好，气温适合、光照充足、雨量充沛，一年中可以换来4个月的气候资源（夏季2个月，冬季2个月），提高效益近10倍，极具商业前景；第三，经过三十多年的经济快速发展，福建经济已经具备比较丰厚的基础条件，工业反哺农业已有可能。所以，近年来福建的设施农业取得了长足发展，设施农业已经由从第一代的塑料薄膜小棚，到第二代的塑料薄膜大棚，再到第三代的连栋温室，已经拥有100万亩设施大棚，目前正在朝向控温、水肥一体化的第四代发展，并在与世界先进理念、技术接轨方面走在了全国前列。

智能化农业技术本土化

美国、以色列、荷兰、澳洲等国家的设施农业开展较早，已经取得许多成功经验，值得福建学习借鉴。据刘波介绍，近年来福建省农科院在学习、引进国外农业先进理念和技术方面获益匪浅，智能温室的软件与硬件、栽培基质、水肥一体化等方面已经完成本土化转化，达到国外先进水平。其中，在智能温室蔬菜生产系统、智能化蛋鸡养殖、智能化微生物发酵床大栏养猪技术、智能化养鱼生产系统、智能化花卉生产系统、智能化食用菌生产系统等方面，均已取得成功经验。

日前，大公报记者参观了福建省农科院与以色列合办的“中以示范农场”，其中的智能化蛋鸡养殖和智能化花卉、果蔬种植基地令人耳目一新。据介绍，该农场是我国首个引进展示以色列成套现代农业技术，融合现代生产、技术培训、示范推广、研究孵化、产业创新、休闲观光于一体的国际合作项目，双方合作投资8000万元人民币，以色列Maagad 现代农业企业联盟提供技术与装备，福建省农业科学院提供土地、基础设施和技术支撑。示范农场建成后，由中以双方联合运营管理。

采访中，刘波给记者算了一笔帐：以种植西红柿为例，每亩投资20万元，产量可达25吨以上，产值15万元，是常规种植方法的5倍，3年即可收回成本并盈利；一个面积2000平方米的家庭生产型标准化养鱼池，以养殖鲟鱼为例，投资900万元，可年产鱼肉50吨、鱼子酱6吨，产值1000万元，3年收回成本并盈利；一个养殖规模12000只的欧盟标准养鸡场，仅需2人操作，实现封闭养殖，投资900万元，日产鸡蛋1万个，全年产值700万元，3年收回成本并盈利；在福清市渔溪设施农业样板示范农场，福建省农科院在引进国外先进设施农业的基础上，自行设计建造的智能化微生物发酵床大栏养猪场，2000平方米的猪舍，饲养了1500头猪，装备投资160万元，只要2名饲养员，可年出栏生猪4500头，年产值700万元，扣除成本折旧后纯利润270万元。而微生物技术的采用使得猪舍没有臭味，很好地解决了环保和循环农业的问题。

转变观念穿着皮鞋种田

今年以来，每天都有大批人士来到福建“中以示范农场”参观，有人建议对参观者收门票，是一笔可观的收入。而刘波却认为：发展设施农业的目的是为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应该定位在生产性的产能上，科技示范和旅游观光只是附带产品，免费参观有利于宣传推广。

刘波说：设施农业是一种革命性的改变，农民因此可以穿着皮鞋体面种田，而且还可以减少六成劳动力和劳动强度，是传统农业不可比的。但需要一个认识过程，因为设施农业一是投资高，平均一亩地要投资20万元，比传统农业高很多；二是总控技术难度大，农民个体难以解决，必须接受总控中心的指令。为此，在福建省政府的支持下，福建省农科院于去年建成了一座设施农业总控中心，可以控制3000个节点，每个节点设计为500亩，按10倍的效益计算，就等于1500万亩的产能，一旦实现这个规划，就相当于再造了一个福建农业。为此，福建省政府从2013年起到2015年，连续三年每年投入2.8亿元用于推动闽省设施农业发展，计划在全省84个县区各建设一座智能温室大棚，发挥示范带动作用。福建省长苏树林表示：这将是福建未来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最有效的途径。

创新农业经营体系 上海新农人创业

顾功垒 新加坡《联合早报》2014年3月16日

在现今中国，“家庭农场”这个概念代表着一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既是农民从一个身份转变为一份职业，也成为提高农业劳动生产力、增加农民收入和走向“人的城镇化”的途径。去年，（中国）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发展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今年相关文件进一步对确立农民的主人地位、确保其权益做出更多诠释，表态要继续改善与解决“三农问题”（农业、农村和农民）。官方陆续释放支持农业规模化经营的信号吸引更多人转向务农，他们相对更年轻，具有专业运营概念，甚至把“家庭农场”当做创业的起点。上海金山区枫泾镇卫星村村民张华（33岁）大专毕业后曾在城乡结合地区的日资企业做过流水线生产管理，过后到亲戚开办的工厂做过销售，也曾自己当老板开过干洗店，但他最后选择回到村里，做起职业农民。

张华的父亲2006年起承包种植了100多亩地，他接手后扩充了耕种品种，除了种植水稻、大小麦（可加工成面粉、面条），两年前还尝试种植黄桃，并在田地旁搭起了猪

棚养猪。

根据金山区发展粮食生产家庭农场的有关文件，张华属于本村农户，具备一定生产经营能力及主要依靠家庭成员完成农田的耕、种、管、收等农业活动，称得上是“家庭农场主”。

张华今年春节前带记者参观他的160亩（10万6667平方米）良田承包地时说，自己不觉得当农民矮人一等，“收成”反而比开干洗店来得强，除了把现在的品种种好，还想着怎么通过新的技术改良品种，提高每亩产值。

他说：“耕种总是要承担自然抗灾风险的，但我小时候种过水稻，平时会向大农户学习一些经验，也希望政府能补贴修筑田里的道路，帮忙提供优质的耕种品种，因为新品种的经济价值高，而这一块让农民自己来做有点吃力。”

除了必要的种子播种费、农业保险，张华还购置了农用拖拉机和收割机，自己出60%的费用，其余的向农村合作社贷款。

多元耕种、养殖牲畜和提高农作效率的经营理念，使张华的年收入从自己开干洗店的近3万元（人民币，下同）增至目前约15万元。他说，黄桃一般种植后三年才有收成，每亩产值据说平均在1万元左右，自己的收入到时可能还会有所增加。

上海市明确创新农业经营体系

枫泾镇卫星村村支书毛江华告诉记者，该村有600户人家，2300人，11家农户中张华是最年轻的一个。他说：“现在的农户有年轻化的趋势，愿意用比较新的理念进行农业耕作，对农村的新发展是好事。”

上海市政府在2014年工作规划中，明确要创新农业经营体系，完善家庭农场扶持政策，鼓励承包经营权向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有序流转，并要加强农业科技创新与推广，发展现代种业，促进农民持续增收。

人民银行今年2月下旬出台《关于做好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金融服务的指导意见》，要求各银行业金融机构要切实加大对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信贷支持力度，合理确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贷款的利率水平和额度，适当延长贷款期限，积极拓宽抵质押担保物范围，并要创新拓宽融资渠道。

官方鼓励 更多人种地

中国官方陆续释放鼓励家庭农场发展的信号，创业务农八年的上海金山区亭林镇周栅村村民蒋剑峰（38岁）受到鼓舞，也感受到农民变成一份职业后，面临种地积极性高涨带来的市场竞争。

蒋剑峰2006年得知中央出台文件支持农业规模化经营后辞去工作，和村民委员会

签合同承包土地种植水稻、大麦和小麦。这些年，想种地的同龄人日趋增多，蒋剑峰承包土地的面积逐年减少，签署合同也改为每年续约。

他告诉记者，如果土地承包经营的总面积减少，意味着他必须想办法增加每亩产值扩充收入。他说：“年年种小麦产量会降低，所以我现在收割之后种植绿肥，改善土地有机质，还可以拿到每亩300元的补贴，保证小麦产量。”

蒋剑峰现拥有168亩地，月入在1万元以上。他也在思考如何提高大米的产量和营销渠道，除了一部分由当地粮管所收购，其余的想办法与别人合作加工成大米销售，提高每亩产值。

就在张华和蒋剑峰谋划如何把自己的农耕事业越做越大，并想方设法提高效率时，村里的其他农民也当起了包租公和包租婆。农民把自家的几亩地流转由政府手上，相当于通过政府这个“中介”租赁给职业农民做规模化经营，每年收租。

这几年随着粮食价格水涨船高，每亩土地的租金据了解已从2006年左右的四五百元，增加到现在的800元左右。

扶持家庭农场 确保利益均衡

上海市金山区农业委员会副主任杨文良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提高农民收益，主要可以通过规模化生产、成立农村合作社，及龙头企业带动做到。

对于家庭农场主来说，政府对承包30亩（每亩677平方米）土地以上的，会给予每年每亩100元（人民币，下同）补贴，鼓励农机耕作，利于标准化和品牌的建设；而对于贡献自家两三亩土地的农民来说，则可把土地当做收租工具。

完善机制 避免经营者无限制获租大片农地

杨文良解释，当局在测算时考虑到在配套设施和技术到位情况下的亩均效益、农户均收效益，既希望承包农户的收益要好于普通打工者，也要确保利益均衡，所以不会让某一农户承包的土地面积过大或过小，也就不能无限制把大片地留给一个承包农户。

据本报了解，金山区约95%的农民委托村委会把土地流转出去，即大家把各自家里的两三亩农地交到政府手中，然后由政府操作，统一找经营者承包土地，再给农民每亩30元的补贴；如果农民私下流转土地，则拿不到政府补贴。

打个比方，水稻（大米）收购价每斤1.5元，每亩约可收获500斤，那么农民可获取的每亩租金大概是750元，再加上政府每亩补贴30元，每个农民每年每亩可收租780元，一户人家有三亩地的话，一年的土地租金可得是2340元。

官方也发现，通常把土地流转出去的农民，多数在外打工，这笔租金对于他们而

言可说相当于是常年“花红”。

将继续调整农业结构

根据上海市关于家庭农场发展指导意见的相关文件，当局拟定今年一方面要完善粮食生产家庭农场的扶持政策，通过培训和社会化服务，来扩大粮食生产的机械化程度，同时要继续调整农业结构，新增5000亩果树发展计划，把草莓等经济果林的家庭农场也发展起来。

金山区接下来还要多发展5000亩黄桃种植，除开市级给予每亩900元的补贴，区里将再额外补贴每亩900元。杨文良说，黄桃通常要三年才有收成，所以政府各级补贴是为了减轻收成前农民的负担，等同于农民在种植黄桃前两年，自己只需投入每亩两三百元即可进行新品种尝试。

他认为，种植结构的调整很重要，除了政府的引导，农场主要“依照自己懂什么技术，适合种什么以及有多少把握”来决定：“现在种各种作物都有培训，也有补贴。如果补贴够，经营得好，收入会增加。”

杨文良另外表示，一些龙头企业可以对农民种植的黄桃进行保底收购，农户种植的黄桃如果自行推销不出去，可以卖给龙头企业进行再加工：“水果有保鲜和保质期，保底收购可以一定程度减轻农户的出货负担，抵消成本。”观察人士：产权制度改革须审慎农业界观察人士向本报指出，规模化生产是农民经营性收入的一部分，不仅得看政策，还得看各地方政府的财政拨款和财政基础；作为产权制度改革的一部分，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增收并不是件简单的事。

多名农业观察人士表示，中国农村土地属于集体所有制，和国外的土地私有化概念不一样。一些在农村出生，后来因为求学、工作等变成非农村户口的居民，实质上他仍然拥有农村的集体资产。

集体资产包括了村里的企业、集体建设用地、村里原先造的厂房对外租赁所得等等。

诸如金山区这样的农业大区，从去年开始已经在三个村试点统计每个村民的农龄（从16岁到户口转为非农村户口为止的年限），通过每户的农龄总和、集体资产总额等项来测算出一个人在集体资产中可得多少经济收益分红，这项工作今年还将拓展试点范围。

有专家向本报指出，如果把一些经营不善的村办企业关闭后重新调配指标，选择优质资产置业，那么无论是购买新的门面出租收取租金，或是建造工业厂房让别人来经营等等，都可视作是扩充集体资产收入的渠道。

不过要是允许农民把宅基地、地上屋和可以拿来种植一点点蔬菜的自留地等全部拿来抵押流通，万一农民把抵押所得花得尽光，农民居无定所等社会隐患将显露出来，认为政府在推出新政之前要审慎。家庭农产品建立“放心牌”从瘦肉精、毒奶粉到地沟油，中国的食品安全频现危机，不过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发现，市民对于直接从农户手中采购的米粮，倒是显得比较有信心。

蒋剑峰认同说，自家种植的水稻一部分被当局采购后，周围的邻居也会到他这儿购买，大家对吃他种的大米很放心。

蒋剑峰说，农药是当局配送下来的，种植技术方面由技术质量员来检测与协调，农技站的职员也会来指导，农户要关注的就是种植管理。

另有农户向本报表示，食品安全须要从源头上建立监督制度，譬如种植水稻的水源是地方上的水利局把关的，水利局就要确保种植的水质无害，如果各个层面都把安全和质量放在第一位，公众对食品安全的信心才会恢复。

还有农户向本报反映，农户和超市对接，把自家种的大米、蔬菜等送到超市，目前对于小农户来说仍有财力负担，不过他们也在想办法，把收割后的水稻加工成优质大米进入市场营销，如果能把销售这一环也做好了，整条产业链就能慢慢建立起来。

社会观察

中国调结构应从保障网入手

美国《华尔街日报》2014年3月26日

中国政府迫切希望拉动消费以替代后劲不足的旧有经济模式，唯一的问题中国家庭不喜欢消费。

由于养老体系不健全，加上完善的保险机制的缺失造成医疗费用过重，中国消费者自然而然地选择把钱存起来以备不时之需。

供职于耶鲁大学的原投资银行家罗奇周二在北京对记者发表演讲时说，没有保障网，所有的中央规划都将失败。他说，你可以让人迁移，给他们更多的钱，让他们有更好的工作，但如果不消除经济上的不安全感，一切措施都不会奏效。

罗奇在他的新书中将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比作一对困在不幸婚姻中的夫妇——美国需要中国的存款，而中国需要美国的消费者。

和很多经济学家一样，罗奇也认为全球经济的再平衡有赖于中美之间不均衡关系

的扭转。美国人要学着储蓄，中国家庭要开始消费。

罗奇是华尔街资深人士，曾在摩根士丹利供职30年，其中大部分时间担任摩根士丹利的首席经济学家。他主张建设福利国家，这有些出人意料，但作为中国政府的顾问，这恰恰是他一直在做的。

罗奇说，在别人眼中我是一个总爱谈论保障问题的人。他认为中国政府对待这个问题的态度是非常认真的。他说，在去年11月召开的10年一次的中共高层会议上公布的改革框架是朝正确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尽管实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但中国在建立全面医保和养老体系方面的进展一直相当缓慢。

在计划经济时代，大部分工人能够得到单位提供的一些基本福利，包括住房、医疗和养老。但是随着这些服务被私有化，以及国企职工数量的大幅减少，保障网的建设需求很容易就被忽视掉了。

2009年中国推出了覆盖全国95%人口的新医改方案，但是根据罗奇计算，政府三年内为此划拨的人民币8,500亿元（合1,370亿美元）经费均摊到个人头上，只有每人每年30美元。医药费的高自负比例使得一场大病或者一次事故仍有可能让一个家庭在经济上垮掉。

养老保障体系也远未完善，许多退休人员只能靠每月人民币100元到500元的退休金勉强度日。或许最糟糕的地方是这些保险关系不能转移，因此到城市打工的农民就只能把孩子留在老家，因为他们很难在城里入学。

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意味着中国家庭面临一个没有光明的未来。虽然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了这么多年，但现今的中国家庭仍如同当年狄更斯笔下英国社会底层的小人物那样过着没有保障的生活，而社会主义原本应当消除这种局面。

很难否认，如果中国政府设法改变这种局面的话，中国将变得更好。如果这对全球经济再平衡有益的话，那就更好不过了。

中国共富道路满荆棘

任慧文 香港《信报财经新闻》2014年4月1日

中共2012年11月召开的十八大释出一个重要信息，把原定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改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虽然从“建设”到“建成”只是一字之差，却标志全面小康社会建设已进入最后的关键阶段，一个惠及十多亿人口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

美好前景，清晰地呈现在全民面前，令人感到美好生活愿望可期。

“小康社会”是邓小平1979年12月向到访的日本首相大平正芳首次谈及的；1984年6月，邓小平会见第二次中日民间人士会议日方委员会代表时谈到：“我们提出四个现代化，最低的目标是到本世纪末达到小康社会……所谓小康，就是到本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人均达到800美元。这对你们来说也还是低水平，但对我们来说是雄心壮志。”

之后，中共十二大和十三大把邓小平这个设想确定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长期奋斗目标：第一步，到199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温饱问题；第二步，到二十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二十一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中国现代化分三步走的策略部署。

2000年10月，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目标，全会决议指出，中国已经实现现代化建设的前两步策略目标，从新世纪开始，中国将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现代化新的发展阶段，这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个新的里程碑。

2002年，中共十六大报告提出，中国要在本世纪头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多亿人口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如文前所说，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改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虽只一字之差，立即激发社会热烈反响。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指出，按照中共领导人接班的规则，习近平将连任至2022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正好在习近平任内；根据习的就职宣言，他会力争不负所托、不负众望，履行历史使命。能否达标，尚须拭目以待。

消息人士说，“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是让农民普遍富裕起来。习近平2013年11月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决定的《说明》中指出，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协调，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发生很大变化，但是“城乡二元化结构没有根本改变，城乡发展差距不断拉大趋势没有根本扭转；根本解决这些问题，必须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必须健全体制机制，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

资料显示，目前中国城乡居民的生活差距仍然太大；一是城乡之间平均收入差距相差三倍；二是城乡之间在子女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住房等方面的福利差距，高达十几倍；三是还有对个人发展更为重要的机会差距；四是目前约有六十万个行政村

的绝大多数农村家庭没有抽水马桶，有时衡量生活状况标准的人均收入还不及有没有抽水马桶。

破除城乡二元化结构、实现城乡一体化，将是改革开放以来，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小城镇和乡村工业发展、取消农业税、建立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制之后，在农村进行的第四次大变革。

如何让农民普遍富裕起来，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培林认为比较重要的有四条：一、实现农民的普遍兼业，农民要富，必须兼业，即从事二三产业，或曰主要收入不依靠农业；二、实现农民工的市民化，国家应制订可操作的农民工及其家庭的市民化规划，争取从2010年到2030年，用二十年时间解决三亿农民工及其家庭在户籍、就业、子女教育、医疗、住房等方面的市民化问题，每年市民化一千五百万人；三、实现城乡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切实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稳步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把进城落户农民完全纳入城镇住房和社会保障体系”、“农村养老和医疗保规范接入城镇社保体系”等具体要求，不能在城市中再形成新的二元化结构；四、实现扶贫对象的大幅度减少，中国目前农村的扶贫对象大部分分布在十八个集中连片贫困地区（国家确定十四个连片为特困地区），这些地区或乾旱缺水，或高寒阴冷，或山高坡陡、水土流失、灾害频繁。

北京三农专家学者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全民共富，说来容易要做难。别的不说，仅让十四个连片特困地区小康，就是一个最难啃的硬骨头；当年因支援国家建设最后沦落到只能屈居于城市环境最差地区的一亿棚改户，又是全面小康的另一个最难啃的硬骨头，而且是历史欠账，不啃不行。此正所谓中国共富道路满荆棘！习近平的中共新领导集体能够披荆斩棘到达彼岸吗？

综合治理

习近平吁党政领导讲廉耻

任慧文 香港《信报财经新闻》2014年3月18日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上任一年多来不断加大反腐倡廉、打虎拍蝇力度，最近更“刑上常委”，把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前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经营的周家帮打掉。这个超越前任的举措震惊中外，西方观察家认为应当重新评估习近平的治国理政能力，

不能小觑这位中共第五代领导人的能量。

据北京消息人士透露，周永康贪腐大案曝光后，中国社科院、中共中央党校等中央智囊机构的专家学者研判认为，揪出周永康“大老虎”，不过是习近平治党治国的前奏。

在习近平看来，要改变党内腐败愈演愈烈、前腐后继的状况，防止出现周永康式大老虎的局面，须要下许多工夫，当前应先从两方面入手：一是建立不敢腐、不能腐、不易腐的体制机制；一是加强对党员干部尤其领导干部的教育，大力挽救干部，同时深化组织人事制度改革，培养接班人，实行吐故纳新。

专家学者指出，习近平深知“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性因素”的道理，因此他针对坊间传言“文革后没信念，改革后没道德”在干部中的反映引民非议的现象，继去年6月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强调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管好干部的重要性，并对政治局委员、常委和各级干部提出为官标准之后，最近又在不同场合一再对各级干部提出要求，包括干部要有理想、信念、价值观，要有主张、有定力；要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要讲修养、讲道德、讲廉耻。特别强调要严明纪律，干部对纪律要有敬畏之心。显示深化组织人事制度改革，培养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习氏为官五标准）的党政干部，以为执政党构筑坚实的组织基础。

三严三实为官守则

消息人士说，针对一些党政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存在的入党做官、胸无大志、不敢担当甚至不知如何理政治国等问题，习近平2月17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上讲话时，语重心长地指出，作为领导干部，必须明白肩负着治理国家的重任。“我们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但仍须改进和完善。

习近平进一步说，“检验我们的制度是否成熟而持久的重要标准，在于能否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此，要大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

习近平所说的核心价值观，就是中共十八大首用24个字概括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24个字从国家、社会、公民三个层面对核心价值观进行表述，覆盖全国各方面意见，反映现阶段全国人民最大公约数。

消息人士续说，针对一些党政干部没有理想信念，精神“缺钙”，以权谋私，贪污腐败，以为清除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不过一阵风等现象，习近平3月9日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安徽代表团参加审议时郑重表示，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做到“三严三实”，既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又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

“严以修身”，就是要坚定理想信念，提升道德境界，远离低级趣味，抵制歪风邪气；“严以用权”，就是要坚持用权为民，按制度行使权力，不搞特权，不以权谋私；“严以律己”，就是要心存敬畏、手握戒尺，慎独慎微、勤于自省、遵守党纪国法，做到为政清廉。

“谋事要实”，就是要从实际出发谋划事业和工作，不好高骛远；“创业要实”，就是要脚踏实地，真抓实干，敢于担当责任，勇于直面矛盾；“做人要实”，就是要对组织对人民对同志忠诚老实，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干老实事，襟怀坦白，公道正派。

专家学者指出，习近平的“三严三实”，直指为人为政的根本，切中干事创业的要害，是各级领导干部行为的守则、履职的保障。也就是要领导干部“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让作风硬起来，才能担当起推进深化改革的历史使命。

不知廉耻怎能为官

消息人士又说，习近平1月28日在内蒙古调研时，特别强调领导干部一定要“三讲”：讲修养、讲道德、讲廉耻，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其中，关于“讲廉耻”的说话，在全国引起前所未有的震撼，人们普遍认为，这是切中党政领导干部存在种种问题的要害，道出百姓的心声。

如所周知，近二三十年来，中国官场官德沦丧、寡廉鲜耻的事实在太多了。滥用公款、大吃大喝不知耻；贪污腐败、行贿受贿不知耻；买官卖官、跑官要官不知耻；背叛国家、甘当裸官不知耻；刑讯迫供、草菅人命不知耻；围堵上访，迫死访民不知耻；歧视农民、打死农民工不知耻；官商勾结、强征农地不知耻；喜新厌旧、包二奶不知耻；大肆敛财、修筑皇宫不知耻。

更有甚者，当前仍有一些党员干部“知耻”却照样“行耻”，明知公款大吃大喝可耻，却转入“地下”照吃不误，简直不知人间还有“羞耻”二字！正因如此，习近平的说话才引起空前反响。可见社会公众对干部不讲廉耻的行径是多么痛恨！

专家学者指出，在中华传统文化中，早有为人的标准，即要“知耻、诚信、明节（气节）、感恩”，“知耻”列于首位。更有“知耻近乎勇”之说，特别崇尚礼义廉耻，

鄙视寡廉鲜耻，还把没有羞耻之心者视作为与禽兽无异。习近平今时今日不忘运用传统文化批评不讲廉耻的领导干部，在中共历代领导人中是罕见的，其对中共党风建设产生的正面影响将会日益显现出来。

两岸四地 世界各地

二零一四国际安全形势十大看点

澳门《新华澳报》2014年3月24日

美国 “再平衡战略” 难有大作为 据人民日报报道，从国内看，美国经济出现温和复苏，但仍未摆脱金融危机阴影。2014年是美国中期选举年，共和、民主两党将继续恶斗内政。加之近年来美国孤立主义思潮抬头，奥巴马不得不更加关注内政事务，在新年度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的腾挪空间有限。

在外交上，美国不会放松对亚太的“再平衡”，因为这里是世界经济的引擎，是国际安全的支点。新举动将包括：一是继续强化与盟国关系。美国要“平衡”亚太，必然会强化同盟关系和巩固新伙伴关系。在日本修宪、集体自卫权和扩军上，美国采取默许态度。但去年12月26日美国对安倍首相参拜靖国神社表示失望很不寻常，表明美国不可能让安倍走得太远，伤害美国的亚太利益。二是着力经营亚太防御体系，争取相关国家军事合作，谋取立脚点；向亚太部署多种武器装备，兵力在有条不紊地就位。三是确保美元体制在亚太的主导地位。美国力推TPP等安排，目的在于阻止亚洲形成统一的贸易集团，全面介入区域一体化进程，确保地缘政治、经济利益。四是修复因“再平衡”而受损的大国关系。

叙利亚 不排除西方动武可能性 2014年，叙利亚危机将进入摊牌之年。自2011年叙出现动荡以来，美国及其盟友立即介入，目标是支持反对派推翻巴沙尔政权，拆散伊朗—叙利亚战略同盟。

2013年8月“化武事件”置巴沙尔政权于危急境地，美、法等国决定对叙动武，并展开军事部署。关键时刻，俄罗斯提出“化武换和平”倡议，同时被巴沙尔和美欧接受。美俄就召开第二次涉叙日内瓦会议达成共识，以实现叙政治过渡。

上述发展给世界造成叙危机有望政治解决的印象。但是，政治解决是有先决条件的，巴沙尔必须满足美及盟友要求，主动下台。这也是美欧主张的“政治过渡”的核心涵义。而这恰恰是双方最没有回旋余地的问题。

叙销毁化武并未消除美动武的口实，只是将其推迟。美暂时不动武的原因有三：其一，叙被迫交出化武，既是美“道义胜利”，也为后续动武免除了忧患；其二，叙军正与极端宗教武装和“基地”等恐怖组织作战，美乐见两败俱伤；其三，反对派尚难推出令美满意并有能力取代巴沙尔的领导人。

因此，一旦巴沙尔参选并蝉联总统，则可能成为美动武的主要刺激因素。理由可能包括指责叙“仍有藏匿”化武，推动国际刑庭指控巴沙尔犯有对平民使用化武的“反人类罪”，并“限期”叙政府交出巴沙尔，如遭拒，就动武，改变战场力量对比，支持反对派推翻巴沙尔。

阿富汗 国家重建存在诸多变数 由于关系到阿富汗的主权和美国未来十年在阿布局，美阿《双边安全协议》经历一年多的角力，终于在前不久成形，并通过大支尔格会议批准。但阿富汗总统卡尔扎伊提出新要求，推迟签署协议。美国以全部撤军及切断对阿援助相要挟，威逼卡尔扎伊尽快签字。卡尔扎伊一方面判定美国不会放弃阿富汗、以此为赌注争取更多权益，另一方面谋求摆脱日后背负“签约卖国”的骂名。美阿最终签署协议的可能性较大，但如若美国启动全部撤军计划，阿富汗未来局势动荡趋势将加剧。

阿富汗将于2014年4月5日举行总统选举。在当前形势下，阿富汗能否按预定计划进行大选，大选会否引发动乱，何人最终胜出，都有诸多未知因素。大选结果需要得到阿多数民众的认可，否则恐将成为爆发内乱的导火索。

伴随美国撤军，阿富汗军警将逐步独立承担国家安保责任，其能力将接受考验。阿富汗塔利班的实力已不复当年勇，卷土重来的可能性较小，但对国家重建的破坏力不容低估。阿塔温和派为谋求撤军后获得更大政治空间，和谈是其最现实选择；强硬派则倾向于等待美军撤离后留下的“安全真空”。阿政府与塔利班迟迟未能展开和谈，阿国内难以实现长久和平与稳定。

乌克兰 俄欧展开“金元外交”博弈 2013年11月21日，乌克兰政府突然宣布暂停与欧盟签署联系国协定，引发了乌国内持续不断的大规模抗议，酿成了继2004年乌“橙色革命”以来最严重的政治危机。这场危机不仅凸显了乌国内政治的深刻矛盾，更折射出俄欧在乌所展开的激烈地缘政治博弈。乌克兰暂停入欧进程，俄罗斯在这场博弈中虽占据上风却并未完胜。

在俄欧各自地缘战略布局中，乌克兰均居于首要地位。随着乌国内政治危机的持续发酵，俄欧在乌博弈随即进入“金元外交”阶段。欧盟计划2014年向乌提供8800万欧元预算支持资金。俄罗斯已宣布将对乌天然气价格降低1/3并购买150亿美元乌国

债。在当前欧元区经济低迷的背景下，欧盟很难满足乌方为达成协议而提出的资金要求。面对俄罗斯在资金上对乌的大力支持，欧盟在2014年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扳回局面尚不明朗。

面对复杂的国内政治局势，乌克兰如何走出政治危机近期将成为俄欧在乌博弈的关键。

周边海域 杂音不改“东紧南稳”态势 2013年中国周边海洋形势呈现“东紧南稳”态势，2014年的海上形势将延续这一态势。

2014年，安倍政府的政策焦点很可能从经济转向安保议题，不会放弃利用东海紧张来推动修宪扩军。安倍表示不会接受“中日共管钓鱼岛”，有些政客扬言将中国的东海油气开发活动提交国际仲裁，再加上“东海防空识别区”后续效应的持续释放，安倍晋三参拜靖国神社给中日关系制造了新的障碍，中日关系短期转圜的可能性进一步降低。双方虽都无意挑起冲突，但擦枪走火的风险依然存在。

南海合作将处于上升轨道，已签协议有待落实。“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将被充实更多内涵，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的细化方案有望出台，“南海各方行为准则”磋商将稳步推进。当然，南海仍然会有杂音干扰，但掀不起大风浪。南海的暗流则是美日等国基于不同利益考量和对国际规则的不同理解，加大介入力度，将南海问题视为牵制和防范中国的重要抓手。

西亚非洲 动荡隐患难以根本消除 种族、教派、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难以调和。南苏丹新生政权孱弱，当权派中的丁卡族与努维尔族内讧难息，危机虽有暂缓的可能，但根本矛盾不易化解，动荡隐患难以消除。埃及“二次革命”后，军方竭力控局，穆兄会被宣布为恐怖组织后不会善罢甘休，正积聚力量，伺机进行新一轮对决，埃及短期内难避动荡与混乱的局面。与穆兄会关系密切的土耳其执政党倘若继续推行过于宗教化的政策，则国内骚乱将再次风生水起。也门、利比亚等国艰难转型，政府维稳进程中将充斥暴力与动乱。

2014年，恐怖势力将继续在西亚北非地区趁乱坐大，“尼日利亚博科圣地”“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索马里青年党”等恐怖组织将加强合作，相互联动，将西亚北非地区打造为恐怖活动的新策源地和大本营。基地组织将加大对地区国家的渗透和搅局力度，肯尼亚、尼日利亚、利比亚、也门、马里、伊拉克等国的恐怖活动有进一步升级的可能。

朝鲜半岛 如何良性互动最为关键 在地区形势仍处僵局的大背景下，朝韩主动向对方显示灵活均有难度，要松动在无核化问题上的严重对立更非易事。2013年的情

况显示，两国内政方面都出现新的不确定因素，可能对外交政策和与对方关系有负面影响：韩国朴槿惠总统支持率从上台之初超过70%跌至年末的40%，直接原因是经济改革目标未能兑现，以及表现为选举过程被质疑、一直未能平息的朝野党争。已有分析认为这将导致2014年韩国进一步收紧对朝政策以转移执政党压力。不论是韩国因此误判形势而调整政策方向，还是朝鲜为避免政局再受冲击而试图把焦点引向外部，都极易导致双方关系再起波澜甚至擦枪走火。

与此同时，朝韩之间良性互动的正能量仍然存在。对朝关系在朴槿惠2013年政绩评价中相对获评较高，她在极其困难的形势下仍未放弃以对话合作为基础的“信赖进程”，被国民认为既坚持了原则又基本稳定了局面。再从她在野时即访问过平壤、并与朝前领导人金正日达成过共识的经历与信念看，在下一步施政中寻机打开南北关系局面，也是可以期待的。

巴以和谈 极端势力威胁和平前景 美国国务卿克里上任后力促巴以和谈，推动双方于2013年7月重启和平进程，计划在9个月内达成最终协议。为防止内外干扰，此次会谈在保密状态下进行。国际社会衷心期望巴以和谈能在2014年取得突破。

美国推动巴以复谈的考虑是：为解决日益迫切而棘手的叙利亚和伊朗问题，需利用和谈营造气氛、体现价值，冲抵俄罗斯不断增长的地区影响力。但美国与伊朗搞缓和，触动了以色列的心理防线，遭致其强烈反弹，巴以和谈面临再度崩盘的危机。囿于双方关系的现状，巴以未来即使达成某种协议，也将因各自内部极端势力反对而难逃厄运。

巴以矛盾演绎至今，正逐步流失解决问题的现实基础。首先，以色列经过数次战争已成为绝对强者，其真正关切在于国家的犹太属性和安全问题，拟在经济和安全领域加深与巴勒斯坦的联系，而弱化后者的国家职能；其次，哈马斯武力夺取加沙地带后，巴勒斯坦未曾建国、先行分裂，统一的民族解放事业不复存在，“两国方案”失去原有内涵；最后，在双方力量对比严重失衡、又缺乏动力的情况下，和谈若想取得进展，强大而持久的外力介入是必要条件，但作为和平“掮客”的美国近年来实施亚太战略“再平衡”，巴以和谈已逐步“边缘化”。

伊核问题 围绕细则讨价还价激烈 经过长达10年的艰苦努力，“国际六方”与伊朗终于在去年11月24日达成了解决伊核问题第一阶段协议《共同行动计划》。《日内瓦协议》是一个“粗线条”的政治协议，还需双方相关专家制定出具体的实施细则后才正式实施。在激烈的讨价还价后，双方达成协议实施细则应不是问题。

《日内瓦协议》实施后，全面和平解决伊核问题的谈判就提上了日程。目前看

来，在未来半年或一年内，美伊难以就伊核问题达成最终全面协议，美伊关系也难有实质性的进展。

首先，鲁哈尼“新政”虽使美伊关系近期出现了一些积极互动，但并没有根本改变两国根深蒂固敌视和互不信任的现状。其次，双方都面临着强大的反对势力。美国会内“反伊派”正努力通过新一轮制裁法案，试图捆绑奥巴马与伊朗谈判的手脚。再次，美在地区主要盟国以色列和沙特坚决反对。两国担心，美伊改善关系会损害他们的安全利益。因此，两国动员一切手段来阻止美伊走近。最后，伊不会放弃包括提炼铀浓缩活动的权利，伊难以在《日内瓦协议》基础上再做出实质性的退让。而奥巴马也不可能完全解除对伊朗的制裁。

网络安全 规则博弈将走向深水区 斯诺登获得为期一年的避难权，至少能在俄罗斯滞留至2014年7月31日。期满之前，还会发生什么；期满之后，斯诺登何去何从，目前不得而知。据称，迄今的爆料仅占斯诺登掌握资料的1%。斯诺登的命运将是2014年网络安全的首要看点。

在巨大的压力之下，奥巴马承诺改革监控计划，最近还发布了评估报告，甚至提出46条整改建议。但是，即使美国改革或松动其监控手法，也不会停止监控行为。今后，打击恐怖主义和犯罪、维护国家安全仍将是美国实施网络监控的重要理由。美国情报机构、支持监控的政客也不会就此罢休。因此，即使没有“棱镜”，也会有其他代号的监控计划，其力度、深度和广度或许会有所变化，但监控本身仍会继续下去。

网络空间治理的国际博弈将继续在多个战线上展开。治理的主体是以联合国及国际电信联盟为主，还是仍以美国主导的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ICANN)为主；治理模式是以“多利益攸关方”为主，还是以主权国家为主导等等。其中，规则之争将继续成为2014年国际博弈的焦点。鉴于联合国第三个信息安全政府专家组2013年6月提交的报告已就网络主权、国际法等问题达成共识，2014年的规则博弈将走向深水区，如网络主权的内涵与外延、战争法在网络空间的适用性等等。

学术前沿

互联网金融

观点说明：4月8日到11日，博鳌亚洲论坛2014年年会在海南举行。互联网金融对国家经济有什么影响？这个问题成为2014年博鳌亚洲论坛的“热议焦点”。本期重点对互联网金融及其监管方面专家学者的观点摘录整理，供领导参考。

互联网金融 是指借助于互联网技术、移动通信技术实现资金融通、支付和信息中介等业务的新兴金融模式，既不同于商业银行间接融资，也不同于资本市场直接融资的融资模式。互联网金融包括三种基本的企业组织形式：网络小贷公司、第三方支付公司以及金融中介公司。当前商业银行普遍推广的电子银行、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等也属于此类范畴。

互联网金融有助完善金融体系 春华资本集团主席胡祖六出席博鳌论坛时表示，互联网金融之所以可以在中国快速发展，是因为传统金融的服务严重缺乏，传统金融对于广大的民众及中小企长期以来未能够提供足够的服务，这对于拉动消费、刺激经济非常不利。而互联网可以帮助中小企融资及消费融资，刺激经济增长。因此，互联网金融是对中国金融体系的补充，并不是分走了传统金融的蛋糕。（香港经济通网站2014年4月9日）

对互联网金融持乐观态度 胡祖六表示，美国的支付宝是最早的，上世纪90年代初就已经创办了，阿里是2002年、2003年才起来，为什么比它晚了10年还能这样发展？因为美国的传统金融体系比较发达、比较成熟，基本上政府、企业、机构和普通老百姓个人，基本的金融服务已经得到比较有效的满足。移动金融这么火爆是因为传统金融有很多不足、很多缺陷，我们很多金融服务没得到有效的普及和满足，所以才给竞争或者市场的需求给我们互联网金融提供很大的空间。（《市场星报》2014年4月10日）

余额宝是一种创新 长江商学院金融学教授、DBA项目与校友事务副院长陈龙：简单的创新冲击却是最大的。余额宝是相对简单的创新，但是它的冲击是最大的。余额宝是渠道的创新，这个产品是货币基金加上支付宝的结合。这个结合对银行传统金融是非常直接的冲击，为什么？因为具有两个功能，一是支付功能，二是还能付利息。最早的金融产品是什么呢？是钱，最重要的金融是交易中介的职能，这个是银行的命根子，当支付的这块让别的机构做，实际上把命根子让出去了，做交易支付的服务有信贷功能，从存款人来说它覆盖了大部分银行想要的东西，这是余额宝做的比较远的原因。（《市场星报》2014年4月10日）

互联网金融促进社会进步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副董事长、总裁王银成：如果从企业存在价值的角度看互联网金融或者金融互联网，很容易找到它的本质。企业存在的价值按照德鲁克的管理思想，是创造客户。为什么企业能够创造客户？是因为他为客

户带来了价值。我觉得最本质的价值就是他的成本，为客户能省下钱来，还能带来他的作用和功能，这是最主要的东西。互联网今天做的很好，互联网金融做的很好，是因为他们的交易成本非常低，又非常方便，让大家感觉到我用它，何必非要用传统的东西，所以逼着我们改变传统的东西，这样对社会的进步是好事情。（《市场星报》2014年4月10日）

互联网金融提高经济活动效率 根据第一网贷的数据，2014年3月份中国P2P网贷参与人数日均49043人，新发生问题平台四家。截至2014年3月底，全国P2P网贷平台共667家。中国投资公司副总经理谢平表示：力挺互联网金融，互联网金融交易颠覆人类行为，将存款、货币、投资一体化。互联网金融的资产规模不大，却有着令人吃惊的增速。互联网使许多交易行为可以跨时空的进行配置，大大提高了人类经济活动的效率。互联网金融如果能在发展过程中扬长避短，充分利用其降低交易成本、提升信息透明度的优势，拓展交易可能性边界，贯彻“开放、平等、协作、分享”的普惠精神，那它将从真正意义上引领一场划时代的金融变革。（南充晚报数字报2014年4月12日）

互联网金融能弥补传统金融的短板 中国平安投融资平台陆金所副总经理戴修宪表示，长期以来，中国传统金融体系由于固守于业绩与风控的要求，存在结构化错位：比如在融资端，相比大中型企业往往能得到金融机构的全方位服务而言，小微企业的融资需求长期以来得不到有效满足。互联网金融的存在，则让这一现象得到正视与改变，以公平与透明特性能够降低信息不对称，从而减少交易成本，提高金融服务的覆盖面和可获得性，使边远贫困地区、小微企业等能够获得价格合理、方便快捷的金融服务。从这个层面来看，互联网金融弥补了在现行金融体系下，传统金融的结构性短板，为实体经济提供支持。（中国商业电讯网2014年4月11日）

互联网金融会倒逼利率市场化 永隆银行董事长马蔚华称，互联网金融对利率市场化肯定是倒逼和促进。以余额宝为例，余额宝确实分流传统银行很多的活期存款，银行的活期存款还是管制的，因此，银行呼吁放开利率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马蔚华认为，对于余额宝“根本不用管”，它只是利率没有市场化的产物。马蔚华称，因为银行体系外有很多金融市场，包括PE、民间借贷、活期理财都比银行高，所以，银行脱媒是必然的。有了余额宝以后，银行需要花更高的利益把货币资金从同业存款吸收回来，所以互联网玩金融倒逼银行的改革，对利率市场化是促进的。（《南方都市报》2014年4月10日）

互联网金融不是发展经济的万能药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名誉院长、

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席林毅夫：互联网金融在某种程度上会帮助中国GDP增长，但绝不是GDP增长的万能药。中国必须持之以恒向技术创新、产业升级进行投资，这些都需要金融服务。我们都知道迄今为止，互联网金融主要是来支持消费的，主要是支持中小企业的，而不是用来支持技术创新、支持大型工业升级的。我们需要有各种各样的金融安排来服务各个行业。当然互联网金融是新技术，我们非常欢迎能够帮助到很多人，但是绝对不能就这样想，就是互联网金融可以解决中国所有问题。（《市场星报》2014年4月10日）

互联网金融对银行利润有影响 永隆银行董事长马蔚华出席博鳌论坛时表示，在中国市场利率未有开放的时候，互联网金融对于大众有吸引很正常。互联网金融对于银行利润有影响，但是影响暂时不大，不过，未来的影响需要注意。马氏表示，互联网金融对于传统金融的冲击，主要来自三方面，首先是互联网提高了支付的效率，可能会切断银行及客户之间的联系；第二是互联网可以出现互通，客户和企业可以在互联网上共同建设一个金融产品，而银行相对封闭；第三是银行可以提供碎片化的服务，可以全面服务小众投资者。对于央行叫停二维码支付，马氏表示，二维码支付的确存在风险，但是相关风险可以解决，在相关风险解决之前有需要加强监管。（香港经济通网站2014年4月10日）

互联网金融冲击银行商业逻辑和思维方式 马蔚华认为，互联网金融，这是一个过渡时期的提法，实际上互联网企业或者是IT企业对金融业这块蛋糕的窥视和进入想法由来已久。无论是职能端、服务端、收益端，互联网企业对银行的根本冲击在于商业逻辑和思维方式。（《市场星报》2014年4月10日）

互联网金融重要性被严重夸大 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陈志武表示：互联网金融在中国的重要性被严重夸大。他指，中国金融市场发展要更有深度，如债券市场要向纵深发展，才能形成金融市场的良性发展。互联网金融对包容性增长是好事，对促进放松管制更是好事，比方支付宝及其他互联网金融产品取得了爆炸性增长，但也凸显了过度监管的高成本。他又表示，在美国愈是欠发达地区，社区银行占比愈高。而在中国，现有民间银行审批思路错位，应加以纠正。中国应在甘肃、云南、广西等欠发达地区加强民间银行审批力度，这些国有金融和大型机构不愿覆盖的地区才是相关部门重点审批发展民营机构的地区。（香港经济通网站2014年4月9日）

包容性增长过度监管成本已暴露对于以余额宝为代表的互联网金融产品的意义。陈志武认为互联网金融在中国的重要性被大大的夸大了，当然了，互联网金融对于更加包容性的增长来说是一件好事，对于促进放松管制来说格外是一件好事，比方说像

支付宝以及其他互联网金融的产品取得了爆炸性增长。而且把过度监管的成本暴露在社会面前。（《市场星报》 2014年4月10日）

互联网金融是炒作 民生银行董事长董文标把传统银行与互联网金融的争战归咎于炒作。他说，互联网金融是炒作，有的是马云炒作，有的是媒体炒作。董文标相信，不管互联网如何发展，人与人之间，面对面交流永远是主要的交流方式。他直言，不要担心银行成末代恐龙，“那是忽悠（骗人）”。

根据人行数据，今年1月内地人民币存款骤降9,402亿元（人民币，下同）。业内认为，存款搬家的罪魁祸首是互联网金融。有财经评论员甚至预言，因为互联网金融的崛起，传统银行20年后或不复存在。（香港经济通网站2014年4月10日）

互联网金融是不公平竞争 3月13日晚间，央行下发紧急文件暂停支付宝、财付通的线下支付及虚拟信用卡产品。央行调查统计司司长盛松成也曾表示，余额宝这些互联网金融，实际上是在打金融监管的擦边球，它和银行是处于一个不公平竞争状态。银行是需要受严格监管的，而互联网金融既不受资本金管理，也不受贷存比管理，几乎不需要什么成本。它对金融体系的影响非常大。（《投资快报》2014年4月9日）

互联网金融需适当监管与行业自律 申银万国董事长李剑阁表示：赞成央行对互联网金融既不取缔又出台新政策的做法。既然是金融就要按照金融的规则来，所以出台政策无可厚非。其次他对有人认为余额宝的出现会抬高银行存贷款利率提出了不同的看法，长期来看，中国的存贷款利率还是会呈下降的趋势。具体怎么管应该经过社会的广泛讨论而不是搞一言堂的方式，横空出世的一个政策来禁止。互联网金融监管应该立法先行，用立法来规范监管的边界。（中国广播网 2014年4月9日）

互联网金融监管将设最低门槛 银监会副主席阎庆民：在需适度监管互联网金融，银监会今后将给定一些基本的最低的条件、门槛。他提出了四个监管思路：适度监管，给定一些基本的最低的条件监管，否则会使金融出现不公平、不平等的竞争；分类监管，给银行也创立一个交易的公平；协同监管，减少监管套利，使大家在一个监管平台上；创新监管，用互联网技术提高监管的便捷效率。

博鳌年会期间发布的《互联网金融报告2014》建议，要建立并完善互联网金融的统计调查和风险监测分析体系，尽快将网络信贷资金纳入社会融资总额统计范围。考虑建立交易信息库，建立统一的安全认证中心，互联网企业要严格隔离自有和客户资金。（南充晚报数字报2014年4月12日）

用创新方式监督创新 “用创新的方式监督创新，用互联网的手段监管互联网”，互联网金融领军企业陆金所董事长计葵生提出：互联网金融创新可以降低成本提高配

置效率增加流动性，它的积极作用远没有真正显现出来，在这个过程中，更需要市场在自律及监管的结合上进行创新，需要更多政策面的关注和包容。互联网金融的监管应该有所为，有所不为，负面清单是一个好的方式。此外，必要的行业门槛必须树立，未来有三方面应加强：第一，要建立标准，通过资本金及行业资质来推进准入制；第二，在政策上要设定红线，资金池与非法集资等绝对不能碰；第三，规范平台运营方式，用平台化的思想去构筑新的流动性体系与风险管理体系。（大智慧阿思达克通讯社 2014年4月10日）

互联网金融需行业自律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以阿里金融为代表互联网金融是解决小微金融的重要途径。互联网金融一定程度颠覆了银企之间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互联网金融主要优势在于利用大数据挖掘技术，降低业务成本。相比银行的数据，互联网金融能够呈现注册用户的动态信息，一定程度上摆脱了依靠抵押品的传统信贷技术，可以通过这些数据来发现消费的行为，用数据进行管理。但他认为，互联网金融须关注的问题是信贷风险集中，缺乏分散机制。企业和欺诈与违约的成本较低，投资人的权益缺乏保障，监管政策不明确，也会是该业务的风险。因此，有效解决上述问题的方法是，促进数据的开放和生长，鼓励真实数据的生长，培育行业自律。

巴曙松指出，互联网金融须关注的问题是信贷风险集中，缺乏分散机制。此外，他还认为，企业和欺诈与违约的成本较低，投资人的权益缺乏保障，监管政策不明确，也会是该业务的风险。他提出，有效解决上述问题的方法是，促进数据的开放和生长，鼓励真实数据的生长，培育行业自律。（财新网 2014年4月7日）

本资料所登言论不代表本编辑部观点，仅供党政领导和决策部门参考

责任编辑：吴健涛 本期编辑：何楚龙 校对：李媛媛地址：城站路 85 号孝感市图书馆
电话：2823087 编辑日期：2014 年 5 月 15 日